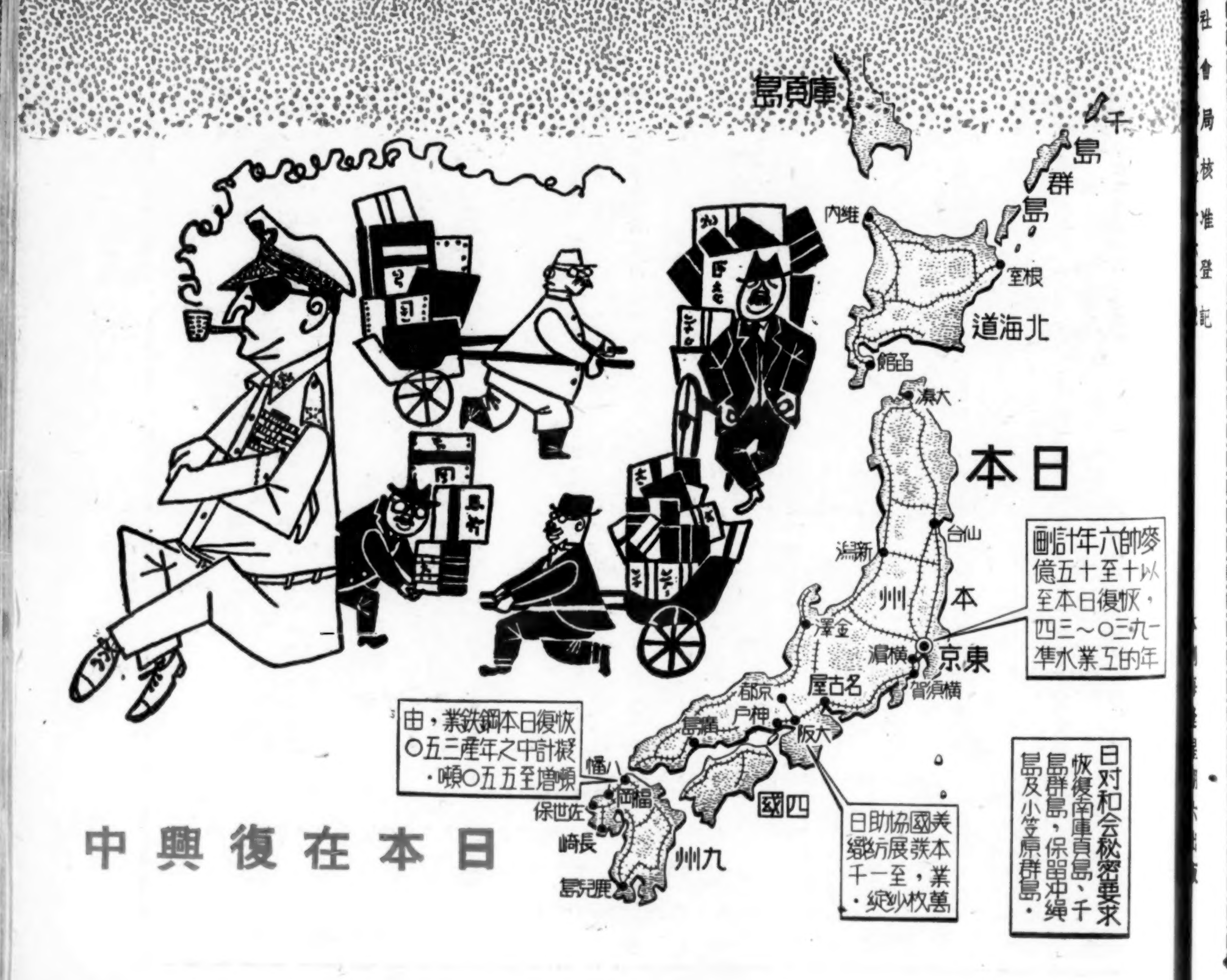
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七期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日本在復興中

世界踏入了新春，放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幅世界「春牛圖」。牛，常被認爲是「喫進去

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的大黑球。物價暴跌甚至比物價上漲還可怕，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便是從物價暴跌開始的。

冷戰



（左）英蘇之間　莫斯科上演劇本「偉大的日子」，描寫邱吉爾（左）與史太林（右）及莫洛托夫（中）談判開闢第二戰場，後來如何背信。

（右）美蘇分手　倫敦外長會議後，莫洛托夫與馬歇爾黯然作別。

一九四七年底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幕壓軸戲，是倫敦外長會議的破裂。美國對蘇進行的「冷戰」，由此達到了一個頂點。世界已經被分成兩個陣營，在進步與後退之間，是沒有所謂「中間」的道路了。





（下）倫敦外長會議：盟國的合作由此告終了嗎？

（左）法蘇之間　法政府右傾，蘇聯駐法撤僑代表團長貴拉托夫被迫回國。

（下）東歐團結　南斯拉夫與匈牙利締結協定，鞏固了東歐新民主國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七期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所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零售每冊法幣一萬七千元

預定　三月共十二期計　平寄：十七萬元　掛號：廿一萬元　航平：廿四萬元　航掛：廿八萬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瞭望臺

百年

一八四八年是被史家稱爲「革命年」（The Year of Revolution）的，到今年剛滿一百年。當時，恩格斯曾爲文描寫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勝利，有一段說：

你可以制定法律，你可以享受你自己創造皇朝的光榮，你可以在豪華的宮殿裏宴飲，你也可以與美麗的公主們聯姻——然而，別忘記——

「那執行者已經站在門口了。」（海涅詩句）

不錯的，工業革命會有過歷史的光榮。在肅淸中世紀殘餘的任務上，它曾盡過歷史的貢獻。然而，百年無多，這位大詩人的預言在今天終於完全證了實。百年前的「勝利者」，已成了一九四八年的「中世紀」的角色了。假如允許讓我套用前引的語句，那將是：

你儘管誇耀原子彈，你儘管乞靈於金圓，你只好扶植法西斯的殘餘，你只好促使世界的分裂——然而，別忘記——

那執行者已經深入門內，你將日益陷於無望的四面楚歌中了。

百年是人生的盡頭，却只是歷史的瞬間。從一八四八年到一九四八年，我們看到這「瞬間」的變化是多麼巨大啊！

世界「春牛圖」

世界踏入了新春，放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幅世界「春牛圖」。牛，常被認爲是「喫進去是草，擠出來是奶」的動物。

但是今天，世界的牛翻身了。今年的「春牛圖」，展開了牛要翻身和驅牛者用力鎮壓不讓它們翻身的鬥爭的畫面。

從歐洲到遠東，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到東方的殖民地，都捲入了這一鬥爭中。

驅牛者的陣營以美國爲領導的中心，它在英法等國統治階級的協力之下，繼續加緊進行全球性的攻勢。

去年年底倫敦外長會議的僵局，使戰後世界所有的問題都以最尖銳的形式呈現了。這次會議的僵持，原是美英方面事前所謀畫，達到了她們眼前的目的。這不但把對德對奧乃至對日和約的解決問題拋到茫茫的未來；同時也對德黑蘭、克里米和波茨坦協定的根本基礎展開了挑戰。她們拒絕了強國的合作，拒絕了一個統一民主的德國和澈底消滅法西斯的日本；她們企圖單獨建立西部的德國，以作爲西方集團和馬歇爾計劃的樞紐；她們又公開計劃復興日本，使她成爲金圓控制下的鎮壓遠東民主勢力的前哨。這一攻勢，不但在分裂德國，也在分裂歐洲；不但在扶植日本，也在控制整個的遠東。它的基本的目的，是在組織資本主義的「西方」來反對社會主義的「東方」。在最殘酷可怕的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的兩年半內，慕尼黑的幽靈又冉冉復活了。

然而，色厲而內荏，外强而中乾。新春第一炮，傳來了美國物價在一星期內暴跌的消息。暴漲暴跌，這不但是美國經濟不穩定的表現，而且更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的大黑球。物價暴跌甚至比物價上漲還可怕，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便是從物價暴跌開始的。

美國經濟危機的激化，固然對於馬歇爾計劃有不利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也必然加緊這個奴役世界計劃的推行。作爲馬歇爾計劃支持的西歐同盟，正在分頭進行。以去年三月英法軍事同盟爲骨幹的英法荷比盧五國同盟在擴大；以法義關稅同盟爲骨幹的法義荷比盧關稅同盟在醞釀；在西部德國，英美雙佔領區的德國聯邦銀行已告成立；英美法三國並定於二月二十三日起在倫敦舉行會議，討論分裂的西德政府的問題。

在希臘，美國的行動已從間接的援助變成直接的參加作戰；從地中海到近東，美（英）正分別通過希、義、土、伊朗、伊拉克和阿拉伯諸國的政府，取得政治軍事基地的控制，西班牙參加馬歇爾計劃據說無問題，法西邊境已於十一日開放了。

在遠東，美國的佈置也在同樣進行中。對日本

1948

世界危机

世界的開步

是全力的扶植；對朝鮮是加强的分裂；對中國是苛刻的勒索。片山內閣的塌台表示着日本政治危機的嚴重化，日本在獨佔的管制之下，將走上更反動的路了。

這是圖畫的一面。

在另一面，世界民主力量對這一進攻的反擊也在有力地發展中。在歐洲，蘇聯於十四日提出抗議，認爲英美法的倫敦會談有違克里米和波茨坦的協定；與德國比鄰的捷波南三國於十七日在布拉格舉行會議，亦將對英美法的擅議德國問題，提出抗議。在朝鮮，北韓無線電台於十六日宣佈日後組織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新憲法的內容，且謂該共和國的首都定於漢城，暫設平壤。用統一對分裂，這一宣佈對於美國在朝鮮的行動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風暴來了

杜魯門剛在呼籲着「反通貨膨脹」，美國物價忽然來了一次暴烈的跌風。在二月十三日前的一星期內，工業品物價指數下跌了百分之十五．九。尤其是十一日芝加哥交易所麥價的下跌，打破百年的記錄，較一九二九年的跌風還厲害。美國經紀商人說：「市場中商人已失去自信心。羣情惶惶，可能爲經濟不景氣的預兆」。（合衆十二日電）

美國正鬧着高物價，物價下跌豈非好現象？爲什麼說是經濟恐慌的預兆呢？原來在高度資本主義制度下，物價高漲固然造成工資低落，購買力減低，人民生活痛苦，以致經濟的破產。但物價暴跌，更是表示生產過剩，商品滯銷和經濟破產。這「飛漲」與「暴跌」，正是美國資本主義臨近危機的一對「孿生兒」。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便是從物價下跌開始的。看這次美國物價跌風之暴、之猛、之速，可知迫臨前面的大風暴，正不知「伊於胡底」呢！

美國的跌風，立刻像傳染病似地傳到了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倫敦、巴黎、多倫多、雪梨、星加坡、馬尼拉、以及哥平哈根等地，都一致先後發生了猛烈的跌風。原來今天資本主義世界各部大都已受金元的控制，美國已等於是資本主義世界本身。所以美國一發生風浪，就難免「如響斯應」，牽一髮而動全身了。

這一點，就是美國統治階級的上層份子，也不是不明白的。例如著名廣播評論家庇亞遜（Pearson），在一月份的「皇冠」雜誌上，就警告「美國已經遭遇到一七七六年以來的最大危機」；這次跌風發生以後，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主席路德（Reuther）也說：「美國的經濟已爲一種『潛進的珍珠港事變』所困擾」。由此可見，無論是「可怕的漲風」（杜魯門語）或「可怕的跌風」，都將使美國繼續發展到應有的結局。

美國如此，那麼環望「美援」或把自己鼻子繫在金圓上的人們，豈非是把「希望的宮殿」建築在沙灘上嗎？

「同種靈魂」的聯盟

馬歇爾計劃之後有了「貝文計劃」，實質上所謂貝文計劃只是從屬於馬歇爾計劃的一種執行的工具。貝文在一月二十二日發表演說，要求「同種的靈魂」聯合起來，換句話說，要求西歐諸國締結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同盟，藉以「反蘇」，從而協助馬歇爾計劃的推行。

「西歐同盟」不是新鮮的花樣，這最初還是由保守黨的邱吉爾前年三月在富爾頓提出的。不過貝文計劃似乎比邱吉爾建議的範圍更大，連非洲也將包括在內。無怪乎邱吉爾得意洋洋了，他於二月十四日發表演說，稱英國的兩黨政策一致，他說：「貝文外長現正趨向團結歐洲之途，使我深感欣慰。事實上在兩年以前，我即已促請他採取這條路線」。可知今天英國工黨政府的政策，已和保守黨毫無分別。

在貝文的主觀上，西歐同盟的目的除了反蘇以外，也許還會有「防美」的作用。但事實上，這個擬議中的同盟一開始就掛在金圓的尖端下，它只有隨時隨地爲金圓所左右，倘如成功，只有便利美國對西歐的控制。

貝文演說前兩天，美國外交政策幕後支持者杜爾斯在參院中說：「必須以團結着德國雙佔領區建立和西歐國家財政和經濟的團結，作爲給予這些國家財政援助的條件」。其目的是「要造成一個完整的歐洲經濟系統，一個防禦性的單位，一個面臨蘇聯威脅而能自立並不致隨時向美國叫救命的集團」，並且揚言：「由於對德國雙佔領區的行政管理，現在美國已經是西歐的政府了」。美國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爾，更在參院委員會中公開聲明，必須「把歐洲的武力統一在美國領導之下」。十三日，馬歇爾在諾克斯維爾演說，對貝文計劃大加鼓勵，他說：「……歐洲十六國是在嚴肅地互相協調以求行動的一致，是保證他們正在放棄强烈的國家觀念與傳統而爲全體着想」。明眼人都知道這所謂「全體」就等於是「金圓的霸權」。

建立西歐同盟的努力是在分頭進行着。擴大英法軍事同盟爲英法荷比盧的五國同盟是一端；擴大法義關稅同盟爲法義荷比盧五國關稅同盟是又一端。法外長皮杜爾十三日聲稱法義關稅同盟將爲西歐十六國同盟的初步，正是對貝文計劃的響應。

但是，馬歇爾計劃既以復興德國爲樞紐，所謂「西歐同盟」自然也少不了她。因此，在另一方面，分裂德國，建立西德政府的計劃也在積極的進行

「春天」的原野　波蘭畫家眼中的美國

。二月七日，德境英美佔領當局公佈了雙佔領區的組織法規，這使戰敗後的德國首次具有了政府的形式：十五日，英美佔領區又成立了「德國邦銀行」，這樣，德國分裂的局面已告粗具，英美法三國還定於二月二十三日起在倫敦談判西德政府組織的問題。配合着這一分裂德國的圖謀，美國的外交軍事活動更伸展到北歐、西、葡、地中海以至近東。



線長結多

然而，事實上，西歐同盟是有極大困難的。且不說蘇聯以及東歐諸國對這一軍事性的同盟表示反對。就是在預定的西歐同盟的構成份子之間，也有着許多鑿枘不相容的問題。

首先，是與德國毗鄰的荷比盧三國，對這一同盟就極感不安，他們會是納粹鐵蹄下的犧牲者，他們最害怕的是德帝國主義的復活，而這與馬歇爾計劃所追求的復興德國的目標是不相容的。據路透六日電：「荷比盧三國對於英法建議……採取極保留態度，三國政府已非正式表示不很願意加入」。

其次，是北歐諸國也反對參加大國集團，據合衆七日電：「斯堪狄那維亞國家……認爲西歐同盟是對付蘇聯的，而且更進一步走向戰爭。丹麥已和瑞典採取同樣立場，反對參加大國集團，預料挪威也將採取同樣立場。……」

第三、英法關係也絕非是「水乳交融」的。這就是倫敦的「經濟學者」周刊也曾這樣的承認：

「……另一個使倫敦與巴黎分裂的問題——德國的前途——是政治的，而且更基本的。法國儘管已經放棄了它們早期的短視的安全政策，而傾向於對西部德國在歐洲復興中的任務的認識。但政治條件却逼着皮杜爾只能走得很慢……

假如在這一問題上沒有保證，任何願意在西德政治和工業發展中合作的法國政府，就不能存在下去。……」

從援助到參戰

希臘的戰事越來越激烈了，雅典政府已日益陷於危急的地位。據路透社六日電傳：「希臘北部的戰事日夜不停，戰線已長達三百哩，東至土耳其邊境，西至阿爾巴尼亞邊境。」配合着軍事的得手，希臘民主政府於六日公佈大赦令，這是一次有力的政治攻勢。

從援助到監督，美國對雅典政府的支持仍未能收絲毫的效果。因此，美（英）在希臘的行動終於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從監督到直接參加作戰了。二月十五日，美國新任軍事代表團團長范佛利特少將（Maj. Gen. James Van Fleet）和駐希英軍總司令唐斯少將（Maj. Gen. E. E. Downs），正式加入了希臘的國防委員會。以前的美英派駐希臘的軍事代表都還是處於「觀察者」的地位，現在却是正式的「指揮者」了。

佛朗哥與庇隆

在濃厚的火藥氣中，兩個小法西斯獨裁者跳躍了：阿根廷的庇隆和西班牙的佛朗哥。

庇隆十五日發表演說，認爲「一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國家的火併已經來臨，歐洲即將發生比上次更殘酷的戰爭，而這次戰爭將決定所有國家的命運」；接着，他又表示：「阿根廷在新的戰爭中自將站在美國與西方國家的一邊」。

西班牙的佛朗哥更受到了華盛頓的「青睞」。美國海軍上將薛爾曼（Adm. Forrest Sherman）最近曾親至瑪德里訪問；美國駐西代辦克爾般森（Paul Culbertson）並曾與西班牙外長阿台育（Alberto Martin Artajo）密談關於西班牙參加馬歇爾計劃的條件。最近，西班牙已與瑞典、愛爾蘭、土耳其、荷蘭與瑞士締定商約，與英法的談判亦在進行中。法西邊境已於二月十一日開放，西葡的關係也稱良好；據傳西班牙已允以十三處海空根據地供美使用。此後西班牙的參加馬歇爾計劃似已無問題了。

固守乎？直入乎？

十五日合衆社有一則電訊，說華盛頓的美國官員相信在今後三四年中，美國在遠東將採取「固守行動」，並稱此項「固守行動悉繫於日本，可能及於朝鮮，而不擬在基本上有效地援助中國」。照我們看，這幾句話却似是而非。日本、朝鮮和中國都將被劃爲美國遠東政策的主要對象，這是對的；至於美國遠東政策的新動向，却顯然不是「固守」，而是剛剛相反的「直入」，這是有事實爲證的。

到現在爲止，美國遠東政策的具體表現是：對日本是一個大規模復興的計劃；對南朝鮮是一個直接控制的「臨時調查團」；對中國是一個巳趨成熟而尚未中止的談判。把這三個東西拼起來，那是十足道地的馬歇爾計劃的遠東版。

對日和約問題久巳不談了，美國現在巳乾脆決心扶助日本的復興。日本不但巳成爲馬歇爾計劃中遠東的德國，抑且有過之無不及。有人說：「法國對德國的立場，猶如中國對日本的立場」。法國巳經屈服了，不是好榜樣。我們能否挺起脊骨呢？會否連法國都不如呢？

這不是杞人憂天。說也傷心，美國人也許視日本爲德國，却並不以爲中國乃遠東的法蘭西。十六日的「紐約時報」社論說：「……很顯然，中國的問題猶如希臘的問題，經濟不及軍事要緊，除非獲致了安全與和平，經濟復興是不可能的」。他們竟把中國祇作了希臘！

二、十八、

美國遠東政策的新動向

——金元美國・工業日本・農業中國——

宋揚



新春以來，這一個半月的許多事實，顯示了美國對遠東的活動，已經有了很大的新的發展。這一個新動向，主要的內容是：從包辦對日和會的企圖，轉到放手扶植日本，造成既成事實，同時，并利用遠東各國政府目前的「困難形勢」，摻和了對希臘及對法義的兩種方式，造成一種「軍事經濟雙管齊下」的特殊方式，滲透到日本以外的其他遠東國家去。這個新動向如果順利發展下去的話，其結果一定會是金元美國—工業日本—農業中國……。

這是一個值得十萬萬亞洲人民，特別是四萬萬中國人民，加以密切注視的新動向！

一 拋棄對日和會

對日戰爭狀態終止以後，兩年多來，美國對遠東的政策，一向是在執行一個「獨佔日本，滲入其他各國」的方針。它的這一政策，在收到若干效果以後，就開始了「締結一個有利美國的對日和約」運動。這個運動，已經醞釀和進行了近半年之久；美國當局滿以為，憑藉金元與武裝的威力，這個運動的目的是可以順利達到的。但是，事與願違，它的這一企圖是失敗了，正如二月十五日「大公報」上的一篇文章所說：

「……美國人的努力是拚命要和日本締結和約，使這一種和約鞏固他們控制該國的果實，以保障日本履行分派與它的任務：反動派和美國在遠東擴張計畫的一個柔順的工具。

「自從美國非常正確的看到蘇聯是這種帝國主義計畫的最大的障礙以後，於是最近幾個月來，它便用各種手段製造藉口，想不使蘇聯參加而去擬訂和約的條款。

「美國政府簡捷了當的宣布波茨坦會議的決議對日本為「無效」，它要求準備對日和約的事情不應交與外長會議辦理——中國曾經在適當的時期被列入外長會議，正是為了這一個目的——而應交與作為遠東委員會委員的十一個國家的會議。此外，依照美國的計畫，在這個會議中，由三分之二多數的票數，便可以通過一切的決議，任何一個大國不能使用否決權。

「衆所週知，在這十一個國家中，有九個國家（包括英國在內）完全是美國的附庸，這一個刀鋒分明是向着蘇聯的，因為在這樣方式之下，蘇聯便不能保衛和平解決的民主原則。

「美國的提議曾經引起中國輿論界的猛烈的譴責，因為中國受日本的侵略比任何國家為甚，所以它特別關心的不讓這一種侵略的重演。中國報紙一致指出：美國的提議正好符合日本人利用同盟國的不和的計畫，而這一個提議絞殺了對於擊敗日本侵略者有決定貢獻的一切同盟國家的權利。新民報寫道：「這一個問題對於我們的下一代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在這一個問題上我們決不能聽從他人的意旨。」

「國民政府在這一個問題上並沒有採取一個堅決的立場。它曾經宣佈它在原則上接受美國的提議，但在兩個月以後，輿論的壓力迫使國民政府作了以下的聲明：「在對日和約的問題上，如沒有蘇聯的參加，中國不願參加任何的談判。」但……中國政府在準備對日和約的程序上提出一個「折衷的提議」，事實上還是幫助美國。這一個提議規定在和會中由多數的投票通過決議，但必須包括英蘇中美四強一致的投票。所以這一個提議是支持美國的計畫的，即：在對日和約的演進中拋棄外長會議，而將這一個問題交與遠東委員會的會員國的會議去討論。……」（M・馬爾柯夫：大國與對日和約）。

這就是說：美國關於「對日和約」的如意算盤，是不可能一帆風順地實現了。這個計劃，遭到了亞洲人民的反抗，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反抗，也遭到了蘇聯人民與其政府的一致反抗。美國當局如果仍然堅持它那錯誤的政策，不僅會加深美國與蘇聯的對立，會加深美國與遠東人民的對立，會加深美國與中國人民的對立，而且，也可能因此使得許多遠東國家的政府，（這些政府是對美國極為友誼的），感覺處境困難。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勝利，主要是遠東人民的血汗創造出來的，任何



一個政府，如果漠視了這點，就會被人民唾棄。……這個結果，當然不是美國當局所願意見到的。

在這種情形下，美國遠東政策的新動向開始了。當然，這個新動向，并不是根本推翻它的舊原則；這個新動向，依然是「要拿日本，甚或朝鮮做一個樞紐」。但是，它以「對日和約」為中心的活動，却是改變了它的新動向，使得——

「美國政府，決定把對日韓的管制從軍部轉移到國務部的計畫，予以無限期的放棄。在去年美國政府曾考慮到這個計畫，那時馬歇爾還希望與蘇聯成立協議，以便及早訂立對日和約及決定朝鮮的前途。現時在最近的將來，這兩個希望都是無法實現了。此間高級官員對於對日和約並不十分注意，這可從一件事實中看出來，即對於中國在去年十一月所提關於召開對日和會程序問題的照會，美國到現在還沒有答覆。」（以上均見二月十五日合衆電）。

美國當局所以要改採這種新動向，是有它的「一石數鳥」的如意打算的：——

第一：它在「事實上放棄早日召開對日和會的意向，而努力增强在佔領下協助日本經濟復興的計劃，以等候更適當的時間，再致力於日本和會」（一，廿七合衆電）。這樣，就可以分散遠東各國人民及蘇聯的力量，同時則造成既成事實，而達到美國當局對於日本的既定方針。

第二：它這樣做法，可以援助許多遠東國家的政府，使這些正在「危急」之秋的政府，不致因為對日和約的問題而「火上加油」。甚至，它已經答應這些政府，即使在將來「時機成熟」舉行和會時，也可以在「合理使用」的條件下，「保持否決權」，以便對付這些國家內部的輿論。

第三：它這樣做法，又可以掩護它的整個遠東政策，用上述第二種辦法掩護第一種辦法，用抽象的「和會」準備掩護實際的扶植日本。

因此，倘使遠東人民再以舊的眼光看美國遠東政策，再以舊的眼光對待對日和會，倘使只注意國際公法、否決權、程序問題等等，而忽略了美國的新動向，忽略了美國在加緊扶植日本，那就正是美國當局所希望，正是美國遠東政策新動向所追求的了。

二 加緊扶植日本

兩年以來，在獨佔對日管制大權的美政府，與麥克沃瑟庇護扶植之下，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已經爬起來了。除了別有目的的政客以外，任何有良心愛國的中國人，對於這樣一個剛被打倒的敵人，帶着仇怨爬起來，而且是有人在旁熱心扶護着，難道能不憤慨，能不警覺注視嗎？

關於兩年來美國獨佔日本及扶植日本法西斯的情形，二月十三日「大公報」上發表了孟憲章先生的「論美國助日復興」一文，詳列事實，極為正確，為節省篇幅，此處不再摘引，可請讀者參考。我們現在要指出的，就是在美國遠東政策新動向之下，這個扶植日本侵略勢力的方針，是大大加强了。

一月六日，美國陸軍部長羅雅爾發表了一篇坦率的廣播，他說「為了扶助日本，使其足以抵擋可能的戰爭威脅（？），美國將幫助日本建設，使其成為强盛、安定、自給自足的國家」。一月九日，片山內閣正式決定「日本四大財閥銀行，即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不在經濟分散法範圍之內」；四大財閥銀行，鼎鼎大名的壟斷資本，就這樣在負責管制責任的美國鼓勵之下，安然無恙了。一月二十三日，美國海軍上將海爾賽，在費城演說，强調「歐洲需要復興，日本也需要復興。日本在將來可或為美國及其未來侵略者中間的堅定堡壘。」過了兩天，杜魯門便透露貸日欵項，而東京監獄裏的戰犯也一批批予以釋放，不但大批財閥遭到赦免，即「支那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駐南京偽汪政府「大使」谷正之等也列入第三批開釋名單中了。

同一天（一月廿五日），申報南京特派員在「外交部官員」方面得到一條重要消息：

「外部頃已接獲美國向華府遠東十一國委員會提出之長篇說帖，陳述扶植日本自足自給之必要，請各盟國贊同，並共襄「盛舉」。該官員不願透露是項說帖是否附有具體之數字計劃，然承認外部對之極為重視，現正審慎研究中。研究結果，將呈層峯核示，最終經最高國策機關決定後，方可訓示我駐遠東委員會官員，表明我國態度。按自美陸軍部要求以五億美元援日之訊傳抵此間後，各方人士均極注意，官方拒絕發表任何評論。一般看法，咸認美對日之慷慨，已超出一戰勝國對一倘具於敵對地位國家所應施予者，而有縱容趨勢。我國為遠東和平之確立久保，亟應有所主張。」（廿六日該報）

計劃的內容，官方尚未發表，但許多蛛絲馬跡，已經可以讓我們看出一個輪廓來。據參政會駐會委員會一月卅日開會時，余楠秋等參政員的提案中指出，「在美國所擬復興日本計劃中，美國政府正式給予日本五億美元貸欵，并自由投資廿億元，計完成之日，將達到日本一九三〇——三四年生產水準」，（一，卅一，大公）。早在吉田內閣時代，日本已有所謂「復興五年計劃」，據說麥克沃瑟總部對這個計劃意見很為接近，若干點上并加提高。到了一月廿四日，聯合社東京電訊又提到日本正在草擬一個「五年計劃」，大概美國

的說牒就是根據這個計劃來的。這個「五年計劃」，一說「六年計劃」，據英文「世界報告」（World Report）透露，主要內容是這樣的：

「…（一）生產增加三倍。進口增加五倍。出口增加十二倍。（二）到一九五三年預計人口將達八千五百萬，依人口的增加，而增加食糧供應。最後一年，尙預定由美國進口三百萬噸穀類。（三）煤增產到四千五百萬噸，鋼鐵三百萬噸。（四）美國以一百二十五萬包棉花，賒與日本作輸出資本，以亞洲各國爲輸出市場。（五）以現存金銀價值一億三千七百萬元作抵押，向美國英國告貸五億美元，購入原料。（六）美國在今年十五個月內，擬借與日本一億五千萬元購買原料，一億購買食糧，四億救濟，共計六億五千萬元。全部六年計畫需要美國投資約二十億元。」

上述聯合社電訊，大體與此相同，但在貿易方面，該電强調：一、須輸入糧食，預料一九五二年爲九億一千九百萬美元，五年後糧食增產百分之十，人口增殖百分之五；二、以棉織品作輸出主幹；三、五年中年年入超，不斷吸入外國資本，最後一年總負債爲十四億六千萬美元，輸出爲十三億九千五百萬，輸入爲十四億九千四百萬，入超一億弱。因此，在貿易方面，實際上是並不「自給自足」，而是有利美國商品資本輸出的。……根據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扶植日本的計劃，大體上大概是恢復一九三〇——三四的工業水平，在和約簽訂前提前實施，將來强迫各國承認此項既成事實。而在事實上，則並不眞正是一九三〇——三四的工業水準，而造成日本生產各部門的不平衡，使其完全適合美國在遠東的需要。

美國當局所以要這麼做法，有人指出它的眞正目的，是完全適合美國資本主義的需要的。這一指出，非常必要，值得徵引：

「讓我們揭穿美國的算盤吧：第一、計畫所需的龐大資金，當然是美國投資，美國以輸出資本控制日本的工業，使日本的經濟生活，一呼一吸都要依賴美國，這一來，日本就變成美國的第四十九州了。把日本圈在美元集團內，再用它爲戰略基地。在本質上，卽復活工業日本農業亞洲各國的日本傳統政策，卽「大東亞共榮圈」的借屍還魂。當然，英國集團是可以分到一杯羹的，它擁有印度棉花、澳洲羊毛，有資本與日本合作。第二、計畫中心是培養鋼鐵工業，達到年產三百萬噸水準。繁榮紡織工業，開拓並霸佔亞洲市場。同時發達了日本國內的肥料工業。這三種工業，棉織品是平時戰爭的武器，鋼鐵與肥料就是軍需品，美國計畫極其周到，平時戰時都要日本能制霸東亞。目的也就在制霸，並不是爲解決日本人民的生活問題。第三、這種工業規模的經濟意義，是要造成日本經濟不平衡發展，使它原料食糧都仰給於美國或美英集團，不能自給自足，排斥了德國的Autarkie制度，變成美國的附庸。這是給美國資本家開拓了日本市場。計畫一旦實施，美國的棉花、食糧、廢鐵、機器等便多了一條出路。如果搞得好，這條出路通亞洲各國市場，廣大無限。第四、對亞洲各國，則置在工業日本之下，首先以經濟壓力——以鋒銳無比的日本貨向我們進攻，摧毀亞洲各國民族工業的防禦工事，進一步就是政治及軍事的威壓了。在美國強大資力支持下，亞洲各國工業，特別是中國的民族工業，是無法與日本工業競爭的，我們將永遠抬不起頭來。將來結果必然是，送礦砂到八幡去冶鍊，送棉花去大阪紡織，送海鹽到日本的化學廠去製造肥料。」（一，廿八，大公報）。

這難道還不是「金元美國——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具體說明嗎？任何一個清醒的中國人，難道還不應當清醒警覺、奔走相告嗎？

也許有人會說，美國的所作所爲，乃是爲了日本人民的生活呀。但是，事實勝於雄辯，美國的這些目的，是爲了日本人民生活的需要嗎？而且，保存日本的許多軍港、設施、機場、訓練日本的自殺飛機隊、恢復八幡鋼鐵廠等等，又是爲的什麼目的呢？……此外，也許有人又會說，慢着呢，美國的這個計劃還得遠東委員會通過呢。但是，美國援助日本復興的工作已經表面化了，麥克沃瑟已將艦艇二十八艦撥交日警，已經取消外商入境限制，「訪日工業視察團」正在東京視察，另一個一百五十多人組成的美國投資團，已經又要從美國出發日本了。那個視察團團長W・傑可勃，正就是美國紡織聯合會的主席，他向麥克沃瑟建議了十六點並且趾高氣揚地說：「美國已經不管亞洲其他國家怎麼反對，我們已決定了做法，我們一定要把日本紡織工業的亞洲市場和殖民地市場恢復！」這不啻公開宣佈，美國爲了推銷它的美棉，爲了爭日本布去南洋換橡膠和錫，爲了將來生產軍需被服，已經允許日本向中國的民族工業開刀，已經默許日本在發展紡織業的基礎上開展海運、造船、鋼鐵等等，日本軍國主義的架子被它撐起來了，中國成了隸屬在工業日本之下的農業國家，而金元美國則將以金元輸出及重工業控制日本的「較低」工業。這樣說來，在美國的這一政策之下，中國豈不是完全變成美國殖民地（日本）的殖民地了嗎？不是眞正成了「次殖民地」嗎？

三 滲入遠東各國

除了「加緊扶植日本」以外，美國遠東政策新動向之中，還有一套法寶，就是「滲入遠東各國」。

有人說，美國的外交戰略乃是「先歐後亞」，「在西線取攻勢，在東線取守勢」，據說美國對遠東各國大概要放一放手了，大概要停止支持反動政府、而促成「自由主義的守勢政府」了。……但是，事實勝於雄辯，儘管正如伊利奧特所說「我們（美國）必須有所抉擇，不能兩面作戰」，美國的困難很多；可是，兩年多來，美國並不是只有「興趣」於歐洲，對於「東線」仍然是並不放鬆的啊！特別是最近以來，遠東各國的形勢，中國、朝鮮、越南、印尼、菲列賓、暹邏、印度、緬甸、馬來……各處的情勢，是一天比一天更緊張了。這個緊張的形勢，一方面說，是使得美國不能不注意遠東，另

一方面說，又使得美國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一個可以利用金元及武裝力量、向迫切期待美援「挽救危局」的若干政府、行使「美援買賣」的好機會。「紐約時報」坦率地說道：

「我們誠然在遠東只能取守勢，但卽是說守勢，也還是有着攻勢的因素的。我們對於遠東，特別是華北一帶的形勢，決不能袖手旁觀了，我們應當知道，遠東或是中國的問題，實際上和希臘是一樣的，是軍事重於經濟的，……魏德邁將軍曾是一位認清事實的人，他的建議，說明我們美國有責任注意這些方面的事情，而且不應當顧忌太多，時間已經十分迫切了。」（二，十六該報，同日合衆電）

在這個理由之下，大美晚報統計美國的許多報紙（實際上反映着美國統治者的意見），最近一個時期，已經不再强調「援助必先以民主改革爲前提」了，而轉向「與其目睹一個廉潔之政府，反不若一個「自由」而腐敗之政府爲可取」了。美國現在已比過去更積極地從事南韓等地的工作，從事印尼的「調停」，關心越南的戰爭，印度的「內爭」了。同時，國務院也在二月六日正式公佈，除原定歐洲「援助」外，尙擬「援助」菲列賓之「戰爭損失及退伍軍人」一億三千三百萬元，對中、韓等國撥款十億元，其中中國佔五億七千萬元，而在中國還有加强AAG的決定。這正如「美國外交界人士在二月七日晚上所說，乃是顯示了美國對遠東外交政策的重要新步驟，顯然的，國務部已決心在遠東方面建立反共障礙物了。」（七日合衆）

美國這樣把對希土及對法義的辦法，摻和了用到遠東方面來，究竟能收得若干效果，此地不及詳論，但是應當說，根據它過去的情形，例如對希臘、法義等國的「援助」效果來看，要想以有限金元與有限武力，澆熄比歐洲更狂大的亞洲怒火，一定是辦不到的。因此，「美援」所能給予亞洲人民行進的阻力，實在不必重視。但是，正如二月十四日的「前線日報」所說，接受「美援」的結果，必然附帶接受若干「條件」，這些美國提出來的「條件」，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二月六日，美國國務院宣佈請求「援華」五億七千萬元。

七日，中美積石山探測團約文簽字。

八日，南京再度研究魏德邁文件。

九日，中美進行開發台省富源及扶植台灣工礦商談。「美方對此極願投資，并着重經濟的及軍事的兩點」（申報）。

十日，宋子文演說「廣東已成化學工業中心」。

十一日，巴大維等飛台。

十二日，美商投資台灣鋁業，在京簽訂合辦草約。

………

對於民族的熱愛，忠於祖國的良心，使我們不能粗心地把這一連串的事實說是「偶合」。據前聯總中國分署長蘭氏（J. Franklin Ray）統計，自從對日戰爭狀態結束以來，美國先後「援華」已達二十億又二萬七千八百元，（見二月二日大美晚報專欄）。又有人估計倍於此數，但是，我們所付出的代價也是鉅大的。善於經商的美國，在「援助貸款」的問題上，的確也是一位好手，它的「條件」眞是一次比一次苛刻，過去二千七百七十萬美元的物資、一千八百萬美元的貸款，已經換取了許多生產、貿易、海關的監督權了，難道這一次竟要乘中國政府之危，大大的換取一些「代價」嗎？站在中國國民的立場上，我們眞是不忍這麼說！

但是，還有更值得我們比前面這些更應注意的事情。在「美援」完成聲浪不斷傳來之際，我們看到王世杰外長二月十三日在參政會駐委會作「秘密報告」的消息，這篇報告是秘密的，別人無從得知，但他在公開的「出面報告」上，却透露了中國外交當局的意見，他說：

「如主張先有和約，再談經濟恢復，實屬浪費時間，對於世界經濟復原一事，中國不但要支持恢復盟國損失之任何方案，卽對敵國經濟，亦願見其復原……」（十三日中央社）

這就是說，當局已經同意了美國扶植日本的原則。與官方關係極爲密切的新聞報，十四日發表這一報告時，緊接着這一報告，又發表了一條政府「最高級」官員的談話，說得更是明白：

「政府最高級官員，十三日向本報記者透露，中國政府業已在原則上同意美國在遠東委員會上提出之援助日本復原計劃。該官員繼卽聲明，中國政府此一行動，與對日和會更係截然兩事。我國對日和會，仍堅持原有立場，卽十一國參加和會，五强保留否決權。該官員鄭重指出，我國人民對日本再起侵略一點，不必過份憂懼，此種不正常心理，對發展中日未來關係，爲一大障礙。……」

過了兩天（十六日），申報上也有同樣記載，據說：「我國政府於上月底接獲美國說牒後，經兼旬考慮，業已確定政策，本月十二日王外長曾與司徒大使約晤，談及此事，申明我將有條件的支持是項建議，王外長十三日在參政會之報告，曾觸及此一問題，並表示我國亦願見敵國經濟復原，據關係方面人士分析，政府此一決定，原因頗不簡單。」……根據這些消息，我們更可以肯定前面一、二兩節的看法：美國旣已決心拋棄和會，則寧讓中國政府保持空洞不可捉摸的「否決權」，而要中國政府支持美國的扶植日本政策了。我們不敢斷定這是「美援」的代價之一，但我國政府的這個決定，恰恰發生於「美援」略隱略現之際，却使我們不能不痛心地留戀這個結論。

日本問題有關中國的百年大計，不論何時何地，中國人民不能忘記這個百年來的血海深仇，不能對不起自己的子子孫孫，甚至不能再讓我們這一世代再爲日本問題流血。誠如大公報所說：「中國人在任何事上都可受欺騙，獨有日本問題上不受欺騙，因爲我們對日本所得的經驗與教訓，太深刻也太豐富了」（二，十七社評）。甚至中國政府，也會在日本問題上遭逢一個重大的考驗，申報、大公報都已向政府提出忠告，勸政府切莫爲了「美援」，而忽視了主權，引起了人民的憤慨。」美國扶植日本、滲透遠東各國的新政策，勢將遭到中國和亞洲十萬萬人民的反對，從朝鮮到南洋，富有民族傳統的東方人民，決不會讓別人安排奴隸的命運！　一九四七，二，十七，上海。

應該復興日本經濟嗎？

宦鄉

一

自對日和會問題陷入僵局之後，美國似已暫時放棄早日簽訂對日和約的意向，而決心先行「在經濟上幫助日本復興」。具體的「復興日本經濟計劃」已於本月初旬提交遠東委員會及各遠東有關國家審閱，中國政府亦已收到這個計劃的全文。

中國人民對於美國這種過份寬待日本的態度，十分感覺不滿；對於日本侵略勢力的可能在「經濟復興計劃」之下復活，尤其深懷疑懼。因此，中國輿論近來對於美國扶植日本復興的舉動，頗多抨擊反對。

很顯然的，這種責難的呼聲很使美國乃至中國政府感到不安與煩惱。於是中美兩國的官方人士遂不斷發表論文或演說，來替美國的政策辯護。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三個人的意見。

北大胡適校長在他論「國際形勢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裏說：「所謂防止德日復興，應該解釋作盡力防制這兩國的武裝與侵略勢力的復活。這裏並沒有不許德日民族在世間過和平生活的意思。德國民族有七千多萬人，日本民族也有七千多萬人；誰也不能毀滅這一萬五六千萬人，可是誰也不能長期掏腰包來養活他們。所以西方民主國家不能不考慮如何替他們保留一部份的工業生產力，使他們可以靠生產來養活他們自己。這並不是過份的寬大」——（全文曾載一月廿八日上海東南日報）。

美國總領事卡勃特先生本月五日在上海扶輪社演說，强調指陳「美國已經解除了日本陸海軍武裝，毀滅了日本的戰爭工業及軍事基地。美國決不會愚笨到過早地把武器再交還到日本人手裏，因爲這武器是美國經過長期苦戰纔從日本人手裏奪下來的。但是美國不能叫日本人老是餓飯，不能不叫日本人生活，也不能叫美國公民無限期負担養活日本的鉅額費用。因此，美國幫助日本經濟復興，僅僅是爲了給日本人生活，決沒有扶植日本成爲反對任何人的軍事台柱的意思，更不如說，日本也不會成爲對中國潛在的軍事威脅。」

中國外長王世杰十三日在參政會駐會委員會席上作外交報告，鄭重聲明「中國政府一向渴望並致力於對日德和約的早日成立，因爲世界和平的早日實現，可以幫助世界經濟早日恢復常態。但迭次外長會議未能成立協議以後，早日締結對德日和約的希望，因之黯淡。吾人誠不應因此而放棄完成歐洲及遠東和約的願望，但如主張先有和約再談經濟恢復，亦屬浪費時間。中國對敵國經濟甚願見其復興，故中國願支持日本經濟復興的計劃，但以這計劃必須確保日本黷武主義不致復活爲條件。」

綜合這三位先生的意見，可得如下的結論。第一、美國既然不願如中國某些人士過去所幻想的那樣準備對日單獨媾和（參閱「中學生」雜誌二月號拙文及「時與文」週刊二卷十二期范承祥先生文），而寧願先行恢復並復興日本經濟，中國政府遂自行表示願意追隨。第二、復興日本經濟是爲了「讓日本人能好好生活」，「好好養活他們自己」並減輕「美國公民的負担」。第三、美國自認決無復活日本武裝與侵略勢力的意思，中國的名流學者也自動站出來替美國提供同樣保證，希望中國人民能够加以接受。

二

八年的艱苦抗戰和慘重犧牲，敎會了中國人民一個很重要的法寶——對於一切問題，只看事實上的表現，而決不受任何美麗的言語或文章的麻醉，不管這言語和文章是出自什麼名流之口和手。這是人民的世紀，不是偶像崇拜的世紀；人民會根據事實來自己作判斷，決不因某一名人提供了某種保證就糊裏糊塗地讓名人們牽着自己的鼻子走。所以，我們在接受胡適博士和卡勃特先生等的保證之前，要澈底弄清事實。

中國人民同意給予日本人民一個相當的「生活」機會；沒有一個中國人願意餓死或毀滅一個無辜的日本人民，更不用說餓死或毀滅七千多萬日本人民。不過，每個中國人民都要十分嚴肅地追問幾個問題：日本眞的沒有「相當的生活」機會嗎？日本經濟眞的瀕於毀滅嗎？美國復興日本經濟眞是只有一個「讓日本人能好好生活」的純潔目的，而絕無其他權力政治的陰謀嗎？先有和約再談經濟復興眞的是浪費時間嗎？

對於這些問題，中國人民根據事實，有了自己的答案。除非中美兩國政府和中美兩國替美國政策辯護的先生們能够用事實來推翻這些答案，否則中國人民將堅決反對美國全力幫助日本經濟復興的政策。

首先，中國人民認爲戰後兩年多當中，日本人民已經有了極充份的「相當好生活」的機會，他們按理應該能過「相當好的生活」。日本和德國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在戰爭中，日本並沒有受到十分了不得的破壞。在戰爭後

，只有一個國家在管制着日本，而且管制政策並不是用軍政府來代替日本政府；事實上，日本無論在制度上，在實質上都是一個政治經濟的整體，日本的政府、管制機構、商業團體都還保持原有形狀和原有權力，並無任何解體或受干涉的情形。當戰爭結束之時，日本曾分散藏匿了二萬四千個工廠、堆棧和貨房的軍需物資於民間，總值估計約五千億日圓之鉅，其中三分之二為五金、棉毛織品及皮革製品、化學品，迄今為止，僅有若干棉毛織品在黑市上出現過，其餘的全部均在藏匿中；再加上在佔領期內，美國佔領軍當局又曾另外搜得了兩千四百億日圓的未及藏匿的物資，其中約兩千億的日圓的物資已於兩年來陸續交還給日本政府。一九四六年的日本收成極豐，一九四七年也在水平綫上；此外，一九四六年佔領軍當局曾由美國輸入糧食七十五萬公噸，一九四七年又輸入一百七十萬公噸；至於原棉、火油及其他物資的輸入，更是不計其數。單看這些簡略的數字，誰能說日本人沒有被允許「過一個相當好的生活」呢？

日本的賠償數量，一再被減低。規定拆卸的工廠由一千一百家。一減而為一千家，再減而為九百五十多家，三減而為九百家，四減而為八百多家；實際拆卸的機器不過只有二萬五千件，其餘的大部份被保留，並奉令繼續開工，繼續生產。日本的工業生產水準一再被提高。鮑萊計劃原來只准日本鋼鐵產量每年定為二百五十萬公噸的，後來提高到三百五十萬公噸；生鐵由五十萬公噸提高到二百萬噸；商船由一百五十萬噸提高到三百萬噸；硝酸由一萬二千五百噸提高到三萬噸；鋁、錳及軸承等原屬軍用原料不准保存的，後來准予保存鋁錳共二萬五千噸，軸承三千二百萬美元。這樣多的工廠被保存下來，這樣高的工業生產水準被規定下來，誰還能說日本人沒有得到「好好過生活」的機會？誰還能說各盟國存心要毀滅日本七千多萬人的生產力？事實上，日本人所保有的生產力比起我們中國來已經高得多多了，不僅「和平生活」可以過，而連「戰爭生活」也勉強可以應付了。

根據上面這些，不能不說同盟國的對日政策實在寬大之至。而中國之能同意這樣的水準，又可證明中國實在已經「過份寬大」。在這種情形之下，胡適先生還要我們中國人替日本再保留一部份的工業生產力；卡勒特先生還要替日本人叫起撞天屈，說日本人要餓死，希望中國人同情美國扶植日本的行動；這眞叫我們這些做中國人的感到一陣陣說不出的辛酸！我們眞不能不懷疑：到底這八年的戰亂，是中國被打敗了，還是日本被打敗了；到底在這次大戰當中，美國和中國是肼肩作戰的盟邦呢？還是和日本是盟邦？

三

麥克阿瑟將軍既已給予了日本人以充份過好生活的機會，照理日本人民應該可以好好過生活了。然而不，日本的生活並不好，不能不一年比一年更多要求美國的援助，從而增重美國公民的負担。日本的工業生產量迄今還只有一九三〇——三四水準的百分之三十強；預算每年要虧空七八百億日圓之多；紙幣發行額達到兩千億的大關；生活指數增長到一九三三年的六七萬倍；大衆的生活愈益悽慘；美國的佔領費用因而也不得不日趨增加，大量公私貸欵都正在考慮中。這又是為了什麼緣故呢？

很明白的，日本人之不充份利用盟國所給予他們的「好好過生活」的機會，而好像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這責任不能叫盟國來負，而應當叫日本人自己負。

首先，日本的反動財閥仍然盤據要津，操縱着全國的經濟政治生活，這是使日本人民不能充份利用盟國寬大政策好好過生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因。全國的物資（指前段所述被隱匿鉅額軍需物資）幾乎全在私人囤積之中，除少數出現在黑市外，大部迄未出籠，結果就促成物資缺乏、物價高昂的現象。大部份的公欵都被用來津貼救濟戰時軍火商，結果國家的開支就達到異乎尋常地大數字。原料及物價管制操縱在大資本家之手，結果一切利益都為私人所得，原料越管越少，物價越管越貴。這三種現象，再加上大衆生活的悲慘，就使得日本的生產數字不能提高。

其次，狡黠反動的日本財閥們故意怠工，藉以博取美國同情，以便爭取更多美國援助，或逼迫美國更加拉攏日本，是日本人民生活不能好好過的第二個基本原因。關於這一點，去年十月廿一日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曾載有該報駐東京訪員F．查蒲曼的一篇通訊，說得很清楚：「依麥帥總部經濟與科學處官員的意見，日本經濟的困難，是資本家們故意怠工的結果。怠工的目的在於爭取同情，以便贏得一個寬大的和約。總部官員們認為日本的資本家、工業家，甚至可能政府本身，都聯合一致，故意鬆弛或停止對經濟復員和建設的努力，一直等到和約簽訂之後。………經過兩年仔細的觀察，美國當局斷定了，日本目前經濟所以混亂，主要的是由於這種消極怠工的緣故。……看情形，日本旣得權益階級正充份利用佔領軍的寬大政策，來故作可憐肰態，希望取得美國的同情，准予盡量削減其賠償數字，盡可能給予最大量的貸欵」。這一篇通訊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最後，美國佔領當局的無意剷除反動勢力，是日本人民無法過好生活的另一原因。兩年多的佔領期內，麥帥總部不僅對這個反動的日本財閥和官僚表示好感，甚而還給予他們以極大的政治支持。儘管也有不少人被「肅正令」所波及，但是他們作為一個統治階級的實際權力却從來不會受到過絲毫影響或打擊。不管麥帥是有意也好，是無意也好，反動份子及其反動行為似乎總是受到寬容和鼓勵的。

因此，我們認為，假如日本的反動財閥和官僚不被肅清，不被趕出全國政治經濟的控制地位的話，日本人民的生活是不會也不能「好好地過」的。這不是我們中國（以及其他盟國）人民准不准許日本人民「過好生活」、不「餓飯」的問題，而是日本的旣得權益階級准不准許他們自己的同胞「過好生活」、不「餓飯」的問題。胡適和卡勒特先生對中國人的解釋和呼籲，根

本上是牛頭不對馬嘴，把對象弄錯了。

至於美國公民在日本佔領問題上的負担，誠然是太重了。但如果不從根本上着手，把日本的反動財閥和政客解決，那今後美國的負担恐怕還要更重——一年比一年更重。假如美國不此之圖，而僅僅作減少賠償、鉅額貸款的打算，希望用這樣的方法來復興日本經濟，那是捨本逐末，未免糊塗了。再要因爲中國人民反對抨擊這種辦法，就感到惱羞成怒，而罵反對抨擊的人是「赤色第五縱隊」，那就更加顯得美國人的淺薄無聊和無賴而已。

四

卡勃特說「美國絕對無意把日本扶植起來作爲反對任何國家的軍事台柱」；胡適說「西方國家決不要扶持德日兩國來抵制蘇聯」。兩個人都好像把美國說成一個聖潔得不得了的國家似的。難道美國的動機眞的這樣純淨麼？當然不。美國之其所以要這樣慌忙火急地扶植日本經濟復興，實在含有軍事反蘇、政治鎭壓遠東人民解放、和經濟擴張美國勢力於遠東、奴役整個遠東的企圖。

先說軍事反蘇。胡適先生責備周鯁生先生不該引用「言論自由的社會裏的幾個私人意見」而貿然斷定「西方國家是在扶持而利用戰時兩個强敵（指德日）以抵制其他一個戰勝的盟國（指蘇聯）。」因此，我們在這裏就不得不限於僅僅引用非私人的正式言論和實際發生的事實，來證明周先生的說法是對的，而胡先生的責難則如果不是沒有看淸楚事實，就是有意替美國做義務宣傳故意掩蔽事實眞相。由麥克阿瑟以下的美國大小軍政要人，會經不止一次地公開聲明「要把日本變作東方防共的堡壘」、「要叫日本人在將來穿上美國軍裝，與美軍駢肩作戰」。就在最近，美國第八軍軍長專駐日本地面部隊總司令官阿契堡還說過，「日本是美國的潛在盟邦，未來反極權戰爭中美國的盟友」之類的話；幾天之前，美國陸軍部長羅雅爾也曾公開表示美國的對日管制政策，將由「使日本完全非武裝化、民主化」，改爲「一面扶植日本自給自足，一面使日本能够有力量對遠東極權主義作戰」。這些話在我們是耳熟能詳，不知胡適先生爲何充耳不聞，爲什麼卡勃特先生還硬要否認。

再看事實。日本的秘密軍事組織仍然存在；作爲侵略主義的基礎及原動力的社會經濟結構仍然原封未動；過去的陸海軍巨頭和反動的財閥官僚今天對日本的政治經濟生活，依然起着決定性的直接間接影響；作爲軍事工業之母的鋼鐵工業、電氣工業、化學工業，並未拆卸作爲賠償，反而在繼續開工；若干海軍基地被廢棄，可是同時也有不少基地被大加改進；舊的飛機場不僅未被「廢場成田」，反而還更加修葺改進，以便容納更多的美國最新式轟炸機，作訓練演習的用途。諸如此類的措施，自是以一個假想敵爲對象，而這假想敵如果不是中國，當然就是蘇聯。

在這種情形之下來扶植日本的經濟復興，美國的眞正用意當然不能說是單純地「讓日本人能好好地過活」（因爲如前節所述，日本人已經可以「好好過活」了），而是要把日本改造成一個遠東反日的戰略基地和人力物力儲水庫。事實如鐵，難道單憑一些花言巧語，就可以把事實變更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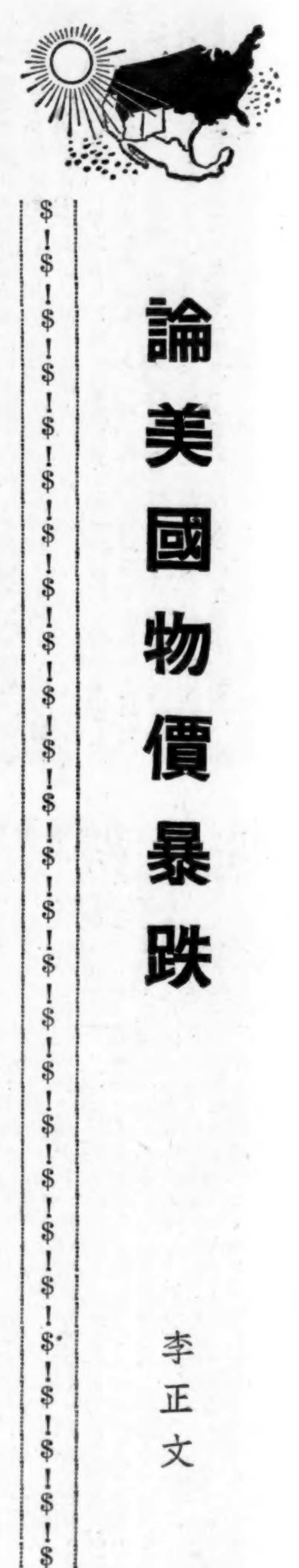
至於政治經濟上鎭壓遠東人民革命運動、擴張美國勢力的企圖，也有官方言論爲憑。去年五月，今已辭職的美國副國務卿艾契遜就曾鄭重聲明「德國是歐洲的工廠，日本是遠東的工廠」，和美國要盡力單獨扶植德日復興的意向。從艾契遜以後，無數的官方人士都曾發表過「任何遠東復興計劃，如果沒有日本工業協助，必然很難實現」的主張。他們一致認爲，遠東目前正處於不安和革命的混亂中，只有扶植日本復興，纔能在政治上遏止革命勢力的膨脹，在經濟上穩定遠東人民的生活。很顯然的，美國是把日本當作遠東的政治經濟安定力在看待了。假如我們不健忘的話，好像過去美國一直是覺得中國應該被看作遠東的安定力似的。自然，卡勃特先生忘記了開羅會議以來美國承認中國爲遠東領袖地位的諾言了。

但美國之視日本爲遠東的政治經濟領袖，並不是眞正把日本當作一個獨立國家看待，而是把她當作自己遠東的第一號奴隸總管和看門狗看待的。美國的眞正目的是要透過日本，控制住整個遠東人民的經濟生活。關於這一點，沒有比美國紡織聯合會主席等訪日工業觀察團團長W．傑可勃說得更露骨的了。他說：「日本的紡織工業是美國工業的安全保障，我們深信美國將來工業上的保障和日本工業的順利復興，以及遠東市場殖民地市場的恢復，有密切關係」；「美國的原棉、美國的資本及管理、日本的廉價勞力、再加上中國的市場，將合併爲一個極好的計劃」。這種把日本經濟從屬於美國之下，通過日本工業來搾壓中國以及遠東人民，然後由美國享受最大利潤，日本分享一點唾餘的企圖，美國人並不掩飾，甚至還說「不顧遠東人民如何反對，都是勢在必行」，卡勃特先生又何必硬要替他的政府飾辭强辯呢？

五

總之，中國人民並不反對復興日本經濟，但中國人民却有三個基本的認識。第一、目前日本的經濟已經够讓日本人好好地過活了，只要日本人能够肅正她自己統治階級的自私自利行爲，只要日本人不爲了政治目的而故意在經濟上怠工，日本人可能過一個比中國人的生活水準更高的生活；因此，美國實在沒有再扶植日本復興經濟的必要。第二、假如日本已經眞正民主化了，中國也不得反對日本的經濟水準再提高，但不幸得很，今天的日本不僅雖民主化還遼遠很，而且還是跟從前一樣，是一個反動勢力與黷武主義已經大見抬頭的國家；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還要提高日本的工業能力，那就等於爲虎添翼，授給侵略者以利刃，將來第一個蒙受其害者一定還是中國，所以中國人民要堅決反對在目前就來談「復興日本經濟」。

根據這兩點看法，中國人民認爲應該先談和約，然後再談復興日本經濟。和約是保證日本民主化的工具，假如日本不會民主化或民主化得不够，那我們儘可不簽訂和約。這不是浪費時間，而是着眼於整個遠東、整個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我們中華民族子孫後世的永久安全。爲了這個崇高神望的目的，就浪費一點時間，就使迫令日本人——一百年來使中國和遠東人民飽受戰禍和犧牲的日本人——忍耐一個很長的時候，又有什麼要不得呢？



論美國物價暴跌

李正文

美國物價高漲，在今年頭半月，造創新紀錄，甚至超過了歷史上最高峯的一九二〇年時代。一月十七日，物價指數開始由二〇八・一四倍（以一九二六年平均物價爲一〇〇）逐漸盤旋下降；從二月四日起，物價情形逆轉，至十四日，竟跌至一八六・五六倍。按 Dow Jones 的工業品物價指數，在十三日前一星期內，下跌百分之十五・九，猪油甚至下跌百分之三十・九。

至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晴雨表」股票價格，按聯合社估計，紐約於一星期許之時間（二月四日至十二日）內，跌落約三十一億美元。合衆社認爲此次食糧價格在短期內的暴跌程度，已經打破近百年來的紀錄，較之一八九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兩度經濟大恐慌時所表現者，實猶過之而無不及。

這種物價下跌，處在戰後今天的環境，有少數人誤解是一種美國經濟好轉的現象。因爲戰後各國，物價高漲的程度，已經成爲衡量經濟危機嚴重的尺度，物價愈高，經濟愈接近崩潰，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無例外。同時，蘇聯不斷減低物價，早已證明是蘇聯經濟欣欣向榮的結果。何況美國自去年以來，天天在喊抑低物價，今年初政府又提高反通貨膨脹的口號，這便造成了一般人認爲物價跌是經濟好轉的錯誤理解。

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物價跌，是表示生產力發達，物資豐富，日益接近「各取所需」的社會階段。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物價跌是表示生產過剩，商品滯銷，經濟破產。在世界經濟恐慌史上看，每次物價下跌，都是造成了經濟的不景氣，甚至跌落的幅度愈大，速度愈快，都是證明經濟恐慌的劇烈程度。試觀美國經濟恐慌史上最嚴重的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其物價降低比例爲百分之五十三・九；較輕的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恐慌，物價跌落百分之三十七・六；最輕的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僅跌百分之三・二。

根據美國此次物價跌落之猛與速，比較美國恐慌史上的前例，我們可以斷言，此次恐慌的深刻性與拖延性，將爲曠古所未有。

美國的經濟恐慌，本來早就應當到來了，因爲條件老早就成熟了，其所以遲遲至今日者，就是杜魯門政府在用犧牲中小資產階級和剝削勞動人民的方法，一再延緩（指爆發時間）下來了。例如一九四六年六月起，美國交易所的股票就繼續跌落了好幾個月，好多經濟學家根據這一「經濟晴雨表」的變化，都說恐慌到來了，但其市價指數（一九三七年爲一〇〇）由一九四六年五月的一三四跌至一九四七年五月的最低點一〇一後，逐漸又回昇到一一〇左右。後來於一九四七年四月起，生產指數日趨降低，商品銷路日狹，存貨山積，處處都表示了經濟恐慌的現象，可是從十月起，又趨回昇。此次物價暴跌，是美國戰後第三次表示經濟恐慌的徵象。在這裏就發生三個問題：一、美國有何種回天之力，延緩恐慌爆發。二、爲何恐慌徵象一次比一次嚴重？三、對於此次跌風，是否還有挽狂瀾於既倒的法寶？

美國華爾街大亨們，延緩恐慌爆發的方法如下：

第一、通貨膨脹　一九四六年美國的工業品生產數量，比戰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農產品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而貨幣發行則增加了三・八倍。何況美國銀行擁有極大的游資存款，一九四六年底爲一千四百零三億美元，超過戰前二・三倍；此外還有發行的巨額公債，遠在一九四五年底，已達二千七百八十億美元，比戰前的四百二十億美元增加了六・六倍。如所周知，存款與公債都是具有潛伏的通貨膨脹性的。從上面的貨幣流通量來看，顯然已超過了必需數字，至一九四八年的今天，雖然手中尚沒有這樣總計的數字，但在個別的統計資料中，已經表示出通貨量是更加增多了。通貨膨脹就是叫人養成「要貨不要錢」的心理，這樣使商品暢銷，逃避停滯，維持高物價使工人實際工資減低，生產費減少，資本家利潤提高的一種辦法。

第二、美國軍隊自從戰爭結束後，仍然保持比戰前多六倍的兵力，不僅在戰敗國內保持着大量軍隊，而且在戰時盟國內也駐有大量軍隊；同時，國家預算中的軍事支出，也比戰前多十五倍（戰前爲十二億美元，一九四六——七年爲一百八十五億美元）。凡此都是維持某幾種工業於不墜的。更何況美國政府於一九四六年，開消於軍事有關的商品購買、交通運輸以及其他服務方面的，竟達三百五十億美元，戰前僅一百六十億美元。美國的軍事開支，對於美國華爾街大亨的賺錢有極大關係，所以他們利用一切宜傳工具，叫囂反蘇，大喊第三次世界大戰馬上到來，這樣就可以保持本國軍隊不至於

復員，軍事預算不至於減少，扶植外國反動勢力的情緒不至於消極，從而軍需訂貨源源而來，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就可以延緩。

第三、對外經濟擴張，用美國人的話來說就是「對外經濟政策」。華爾街大亨實行經濟擴張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美國資源對外貸款，此外在個別國家內利用武力支持統治者等等方法，鞏固美國壟斷資本家在國外的地位，擴大國外市場。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就是由於美國受生產過剩經濟恐慌的壓迫過於沉重，而痛感國外市場狹仄所致。因此，美國的貸款並非救人，實際是救己，正如患胖病者之放血。其軍事援助國外之搖搖欲墜的統治者，主要目的並非有愛於該統治者，而是可以保存本國的一部軍需訂貨，且可以藉此換取該國若干經濟利權，使之購買美貨。

總之，經濟恐慌愈緊迫，上述三種方法也就愈加緊推行。就是說，此次物價暴跌，可能使杜魯門政府在數量上和在速度上，更將加強通貨膨脹、軍事支出、對外貸款。這樣可能再度延緩經濟恐慌的爆發，但想根本避免或緩和未來的經濟恐慌，這不僅絕對辦不到，而且在時間上愈延期而將愈嚴重。

對於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人工克服政策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是根據羅斯福的新政措施，和凱恩斯的「消費不足論」產生的不倫不類政策。

無論杜魯門主義，也無論羅斯福新政，甚至凱恩斯經濟學說，都是不瞭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社會性生產與私人性佔有間的矛盾），而單純認爲生產過剩經濟恐慌是消費不足所致。雖然杜魯門主義與羅斯福新政有其理論上的共同點，但在二者的實際政策方面却有原則上的不同。羅斯福的新政，一般說是有其相對的進步意義，而杜魯門主義則是戰後無以復加的十足對內保守、對外擴張的政策。羅斯福時代，固然也實行過通貨膨脹以克服一九二九年爆發的大恐慌，但當時是因爲廣大的人民羣衆負債過重和農產品價格過低，而才實行貨幣貶值百分之四十，以減輕人民的負債，和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反觀杜魯門的通貨膨脹，是恰恰在戰後每人都有相當戰爭期間的「延期需求」（即戰時有錢買不到東西所儲蓄起來的很多錢）時實行的。通貨膨脹、物價高漲，這樣就把中小資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在戰時辛辛苦苦所積蓄的錢，拱手轉讓給了壟斷資本家的荷包裏。何況羅斯福曾規定過最低工資制度，而杜魯門則頒發了許多反勞工法案，這也可以看出：前者是有意保護人民利益，而後者是公然剝奪人民利益的。

羅斯福根據「消費不足」理論，是把消費力藉大規模舉辦公共事業而送給本國的廣大失業羣衆，例如TVA（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工程，尤爲有口皆碑的善舉，他用這種方法提高人民的消費力，以緩和生產過剩的尖銳性。但杜魯門則把剝削本國人民大衆得來的消費力，以貸款「援助」外國的形式送給他國的保守統治者，所謂「援助」土希兩國的杜魯門主義，「復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以及最近正在討論中的援華五億七千萬美元貸款，都是企圖緩和生產過剩的。不過杜魯門的這種人工克服政策，將造成本國更多的失業者，本國消費力的更加不足。對於接受貸款的外國說，都用於不事生產的浪費上，美國想收回本利是非常困難的，因爲美國將來所要收回的是美元，而非實物（美國多的是物資），那末美元從何處來呢？這是一個不可解決的矛盾。

總之，羅斯福的新政是向富人征收重稅，以救濟人民的貧困；杜魯門主義是向人民征收重稅，使華爾街大亨發財。因此，羅斯福的新政，對於恐慌能夠起少許緩和（雖然是非常短暫的）和延期作用，但杜魯門主義卻起了高度加強（雖然也一再延期了）作用。這就是羅斯福與杜魯門在同一「消費不足論」上的根本不同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能獨立而只能依靠美國生存了。甚至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如大英帝國，也不能例外。由於這種關係，美國在經濟上的一切變化，都會非常敏感地反映於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領土遍及全球，其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也特別比其他國家較多，所以對於美國的敏感亦特別大。試觀美國的股票跌風，從二月四日起，立刻像排山倒海的怒潮般衝出了國境。首當其衝者，自然是英國及其屬領。例如在英國的倫敦，單單英伊石油公司的股票一種，在七天內就慘跌了二千七百五十萬英鎊。加拿大的工業中心都市多倫多、澳洲的首府雪梨、英國遠東的重鎭星加坡、以及美國附庸菲律濱的首都馬尼拉、丹麥的京城哥本哈根、法國的巴黎等地，證券交易所都發生了空前的跌風。這證明，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奴役其他國家的成功，因爲這些接受美「援」貸款的國家，形式上雖然獨立，事實上巳經成爲美國的第四十九州，與美國壟斷資本發生了有機的血緣關係，所以神經總樞的紐約證券交易所一出毛病，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就發生同樣毛病。至於不接受美國壟斷資本約束的國家，大至蘇聯，小至捷克，則不僅毫不爲美國的經濟危機所影響，而且在更沉着地走向繁榮的大道。

爲什麼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做法美國股票跌價呢？前面巳經提到，證券交易所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晴雨表」，它首先預感到，美國的經濟恐慌，將促使美國工業品傾銷，與各國輸出工業以嚴重打擊；同時也將促使美國輸入減少，以致輸出國家賺不到外滙，無法取得必要原料。最後結果，就是由於美國經濟恐慌，與美國出口貨相同的各國工業，將陷於推銷困難和生產過剩的窘境裏；同時，依靠外國原料生產的各國工業，將因無外滙買不到原料而陷於生產不足的恐慌裏。這就是各國股票「同情」跌價的原因。不過應當明白，今後各國如發生恐慌，要是完全歸罪於美國的影響，這是錯誤的。因爲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們，不願在經濟上實行民主改革的自力更生措施，而寧肯採取依附別人的外援政策，以致自己的命運也受他人擺佈，無法自主。

最後應當特別指出，不論此次物價暴跌，是否成爲大恐慌的直接導火線，但其更加接近了恐慌是毫無疑問的。同時，此次跌風，對於美國經濟方面的損失，固然很大，但政治方面的損失，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杜魯門天天向全世界誇耀美國的經濟威力如何如何，今天巳「不打自招」，拆穿西洋鏡了。原來「獨佔」原子彈和金圓的王國，實際上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此外在國內政治上的影響一定也不小。今年是美國競選年，華萊士的競選運動，可能藉此得到國內人民更多的支持。

東方的不安

美國記者筆下的南韓（一）



美國軍人成了南韓的大地主

土地改革沒有實行；美國軍官都成了大地主；
牢獄中塞滿了農民和工人領袖。

美 Mark Gayn 作
淑之 譯

也許美國在朝鮮所鑄下的最不幸的大錯，就是沒有實行土地改革。

佔領軍當局最愛用的論點是：這件事最好留給未來的朝鮮政府去做。我們沒有理由干預朝鮮的內政。

但是京城最敏銳的觀察家們都相信。假如美國能使朝鮮的農民獲得經濟上的民主，給他們以希望，一九四六年美佔領區裏普遍的農民暴動和流血，是可以避免的，美國的威信也不會那樣慘落了。

朝鮮的土地所有權問題，比任何國家的都嚴重。農民中十分之八都是租別人的田地的。每四個農民中有三個是負債的，而利息又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很少人能有清償債務的希望。

一九四五年美軍在朝鮮登陸後，就採取兩個重要步驟：一是把日本人全部的土地，約佔耕地的五分之一，放在美軍管理之下。另一個步驟是平抑地租，使它不超過收穫的三分之一。（在日本人統治下，地租爲收成之半。）

美軍是朝鮮最大的地主

今天，在美軍佔領朝鮮的二十六個月之後，美軍實際上是朝鮮最大的地主了。朝鮮的「不在地主」，世界上最貪婪的地主羣之一，仍擁有朝鮮的大部份土地。佃農們辛苦終年，到年底却發現自己的負債比前年更重。

朝鮮是一片崎嶇的山地，從地平線的一頭到另一頭，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的稻田，塵埃滿佈的小市鎮散在鄉間，人民的貧困更非筆墨所能形容。

有一天，我和另一個記者漫步着來到一個小村子裏。我們蹲坐在一家農場上，和一個說話緩慢、謹愼而疲乏的農夫閒談。稻已經收割了，佃農們却又得準備再一年的艱苦日子。場上漸漸的擠滿了人。村會開始了。

七分之六是佃農

這村子有七十戶人家。六十家以上是佃農。大部份的土地是屬於鄰近市鎮上的地主的。最大的地主姓蘇，他的田地遍佈全郡。同我們談話的那個農夫租了蘇某一英畝田。他說：「地不夠哪。我有五個孩子。只不過夠開銷罷了。田能多一倍就好了。」空下來的時候，他替別的農民做點零碎工作。

我們問起田租。「收成的一半」，他肯定地說。他也曾聽到傳說美佔領軍政府曾下令減租，佃農只須付收成的三分之一作田租；但這消息顯然是不確的。「我們把所有的米都交給軍政府，政府只給我們一半的錢，其餘的一半都交給蘇某了。」

我們又問別的佃農。他們都付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收成作田租。鄰村裏的佃農也是這樣，鄰郡裏的也是如此。軍政府裏的朝鮮職員和蘇某顯然串通在一起了。

村子裏的地價，按官價計算，約合一千六百元一英畝。可曾有買賣呢？他們都微笑了。

「我不曉得別人怎樣，」一個佃農說，「但是，不管價錢怎樣低，我總買不起呀。」

他們談到貸款。在日本人統治下，他們可以向官辦的農村貸款社借錢，年息百分之二十四。但是現在他們需向地主兼高利貸者借錢，要出百分之六十的利息。借款到期了，他們就向別一個高利貸者借錢來還給債主。

他們不愉快地笑着說，「只有蘇某一個人沒有欠債呀。」

這村子裏的情形，不比別的村子壞，但也不比別的村子好。各村間的貧困和不安，都是同一類型的，情形只不過小有不同罷了。只有激烈的措施——像擬定中的日本土地改革方案——才能改變整個情形。

但是美軍政府強烈地反對任何激烈的辦法。一位將軍在和一位政府官員討論日本土地改革時，祕密地告訴他的客人說：「那是共產主義呀。我可不要那種辦法。」

一個收糧官堅持說，朝鮮人「已經習慣於這種制度了」。接着他又承認，他曾經到過一個鎮上去挨戶搜查「左派分子」，搗毀農會的辦事處，又在鎮上協助成立朝鮮民主黨支部——該黨是由李承晚領導，由軍政府裏的地主和朝鮮官僚們所組成的。

在基本上，那是保守份子在反對激烈改革。但是美國人也和過去日本人一樣，和朝鮮地主做了朋友了。一個美國軍官說：「喔，這傢伙呀，你去過他的私第嗎？他眞是個了不起的主人呀——菜都用金碟子盛的，還有他從巴黎帶回來的酒呀。」

土地改革計劃被絞殺

一九四六年初，前軍政府經濟顧問勃恩斯博士（Dr. Arthur Bunce）替朝鮮美佔領區起草了一個土地改革計劃。按照這個計劃，以前屬於日本人的土地，全部分給佃農和小農，分得土地的農民，把四分之一的收穫交給國家，十五年後，土地就歸他們所有。

這個計劃的主要缺點，就是對於朝鮮「不在地主」的廣大地產，絲毫不動。（在日本，大地主的土地，全部須分成小塊，重新分配。）但是這計劃多少部份地解決了朝鮮最迫切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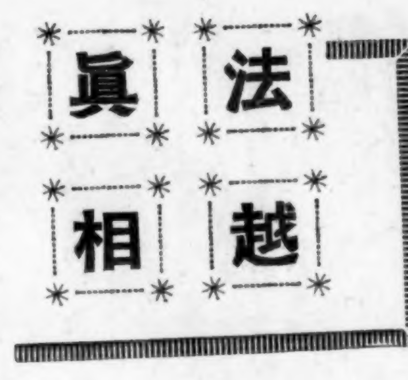
勃恩斯的計劃，被美國軍官（他們稱這計劃爲「勃恩斯愚行」Bunce's Folly）、在美軍政府工作的朝鮮人

據最近的報告，由於聯合國所謂朝鮮委員會的代表前往朝鮮，引起了南韓人民間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和流血，重復出現在朝鮮。美國方面指責這是受着北韓蘇方的挑撥。

但是，以下面所譯美國名記者Mark Gayn的報道，南韓的不安，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讀者看過這篇文字，就可以知道。Gayn是美國「芝加哥太陽報」和「下午報」的記者，戰時到過重慶，戰後來過上海，去年秋間在朝鮮幾個月。這篇原文分兩天連載於「下午報」(去年十一月四、五兩日)

法越真相

美 Andrew Roth 作　一葦 譯



和納粹鬥爭過來的法國人，在越南做着征服者；法奸和納粹份子，重復趾高氣揚了。

是一個「寧靜」的西貢之夜。只有若斷若續的機關槍聲，衝破四郊的沉寂。在一個年青的法國軍官的家裏，一位從海外來訪的客人，向主人請教他的部隊的活動情況。軍官冷靜地答道：「這個星期，土人殺死了我們的一個夥件，所以我們走到他被殺的地方，在附近的田裏抓了幾個土人，用繩子綑着他們的脖子，然後把他們拖在汽車後面。拖了幾公里後，他們都死去了，我們便把他們丟在路旁，作為一個警告。」

那位初到越南的客人聽見了，問道：「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幹的？」青年軍官倒像對這一問覺得奇怪，答道：「可是，他們殺死了我們的夥件呀，不是嗎？」他並沒有看出這些罪惡的殘殺手段，和納粹在法國施行的恐怖政策，有甚麼相同之處。

雖然現在据守着越南四圍橋頭堡的法國人，和法國革命時代的英雄，或者堅決抵抗納粹的法國地下軍，都是屬於同一種語言和國籍，可是在他們之間却沒有相同的地方。

在歐洲，法國人是以沒有種族問題的煩惱見稱的。可是在這裏，他們是屬於「主人種族」的。「下賤的東西」（Ces salaud）這個詞兒，是法國殖民官員給越南人民的通稱。甚至最微小的事情，都有偏見存在。糖和布的配給從來就沒有一視同仁地分配過。戰爭期間，歐洲式的白糖來源短少了，法國人便禁止製造安南式的糖，以增產歐洲式的來供給少數的歐洲人。一千安南的公務員，收入只及同等官級的法國人百分之六十，家庭津貼還要少得多。

一九四五年六月，法國當局下令禁止一切越南律師的工作，不管他們的政治態度是怎麼樣。若果他要繼續操業，就得個別申請。同時，法國人殺死了越南人，是不能算是謀殺的，因為法律也有雙重標準的。法官和陪審官都是法國人。同樣的罪案，越南人要坐上很多年的牢，法國人却很容易就放過了。甚至西貢的體育會，也只有「歐洲人或同化人」才能夠參加。這裏所謂同化人，就是指歐亞混血兒或少數的取得法國籍的高等越人而言。

十一月裏，法國學院常任祕書Georges Duhamel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我問他法國是否可能像英國對待緬甸一樣的明智，來對待越南，這使他覺得有點尷尬。會後，他把我拖到一旁對我說：「現在這個世界，只有兩大衝突，那就是對共產主義的和對有色民族的。在這兩點上，法國和美國是並肩作戰的。可是我們窮，你們富，所以你們必須給我們幫助。」

在越南，法國人是征服者，而且表現了全部征服者的威風。「法國聯報」在第一版的頭條地位，加框刊出二十年前法國大帝國主義者 Lyautey 元帥的一句話：「爭取殖民地者的美名吧，特別是在這評論界似乎要把法國殖民工作的偉大和成就完全抹煞的時候。」西貢市長 Lami，一個社會黨人，他甚至在越南也還保留着一點社會主義的思想。他在西貢電台廣播說：團結法國聯邦的，「再不是仇恨和壓迫，而是在平等基礎上的義務、權利、與互相了解。」這句話，曾使當地的法國人發生憤怒。作為征服者，法國人用了一切手段來維持他們的統治，不管手段是怎樣的卑鄙。Caodacists 是當地的一種宗教組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八月期間，曾追隨日本，反對法國。可是現在法國人却和他們勾結了。交趾支那偽政府的宣傳部長阮文海，於一九四五年在星嘉坡電台廣播說：「法國強盜和殺人者之被推翻和濒於滅絕，我想起來至為欣慰。」現在法國人却很願意原諒他了。法國聯隊裏約有德軍一萬五千名，差不多全部都是希特勒飼養的狂妄的青年納粹黨徒，可是法國人一點都不以為羞。

也許他們和親日份子及納粹黨徒的勾結，是毫不費力的，因為大部份在越南的法國人，自己本身就是落過水的親日份子。現在我們在報紙上常常讀到對「可憐的

和美軍裏的朝鮮翻譯員聯合起來推翻了。這些朝鮮人大半都是地主階級出身的。

他們舉行了一個「民意測驗」。測驗的結果，說明百分之八十的朝鮮農民都反對土地改革，據說佃農們所要的，是由將來朝鮮政府所起草實行的土地改革。這個測驗是用來打消「勃恩斯」計劃的。

所有這些消息，都在一九四六年美佔領區第一次選舉之前透露出來的。選舉結果揭曉後，大家都明白，佃農們等待的日子可長得很哩。臨時立法會議的四十五個議員中，只有兩個是眞正下田工作的農民。

佃農們失望了

希望美軍來了就可以把他們從奴役中解放出來的朝鮮佃農們，現在失望了。當他們聽到蘇聯區施行普遍土地改革的傳說和共產黨宣傳報告，當他們所付的利息一天天高起來，當農會被解散，警察們搜查穀倉，把糧食運到城市裏去，異乎尋常地貪污野蠻的時候，他們的苦痛就更深了。

這一切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一九四六年的農民大暴動。成千成萬的佃農在全美軍佔領區襲擊朝鮮警察的哨崗，血像河一般湧流着，監牢裏塞得滿滿的，就是在日本人統治時期，也沒有塞得那麼滿呢！

監獄快要漲破了

朝鮮解放了二十六個月之後，美軍佔領區的監牢裏塞滿得快要漲破了。成千的「不穩份子」，都逃到山裏去。

在京城很少人知道美軍佔領區裏政治犯的確數。朝鮮警察日夜廿四小時都忙着捉人，被捕的人數又無從查問。但是大家都曉得，過去兩年間的三次大規模捕人，就是日本人統治下也沒有那末利害。

今天朝鮮南部的警備力，比日本人的「警管國家」時期還要龐大。那時候日本人認為國家監牢已經足夠對付了，現在有些場合却還須把辦公室和學校臨時匆促地改成監牢。

除了那些已經躲藏起來的以外，差不多所有的朝鮮工聯（Korean Federation of Labor）領袖，龐大的農會（Farmers' Union），鄉間的民主青年聯盟（Democratic Youth Alliance），一度勢力龐大的人民黨（People's Party），和其他二十多個左翼黨派的領袖們，都已下了獄。一年前，京城的一個高級美

戴古將軍」表示同情的信。可是戴古在戰爭期間是非常媚日的，他曾經寫道：「越南的法國當局將盡最大的力量與日軍合作。……我們對日軍的軍事行動，必須予以最大的便利。」安南銀行行長 Paul Gannay 曾於一九四二年至四四年間住在日本，他也許是越南最大的經濟親日犯了。現在的「法國聯報」社長 Henry de la Cheorotiere，曾把他的「消息報」以二十萬越幣的價格賣給日本人。很多人從法國逃到越南來，企圖洗脫親德的罪名。「一九四六年初，在西貢住着約四百名的上校軍官，他們大部份是貝當份子，因爲恐怕被控爲親德而逃出來的。「西貢日報」的編者 Jules Haag，也就是以前巴黎的法奸報「日報」的編者。他是以中校身份，到這裏來替達倘禮安上將負責新聞聯絡工作的。此外還有很多小法奸，他們有些是曾經替納粹祕密警察做諜報工作、殺害法國地下軍的。

法國的殖民地親日份子曾經在戰爭期間拒絕英軍登陸，也許爲了同樣的心理，他們今天是非常反美的。每一個美國人都被認爲是「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先遣軍」；對美國人表示友好，就等於冒險。在美國領事館附近和閱書室，常常有公安局（ Surete 特務機關）的特務偵察。最近有一個美國副領事的廚子被法軍汽車碰倒，他的脚踏車也碰碎了。那位美國副領事請求賠償。結果非但得不到賠償，廚子倒被憲兵抓去了。他們說廚子散發傳單，雖則他是很明顯地沒有任何政治意識的。他被打了一頓，兩日後經過一再的審問後，才被釋放出來。

有一個美國領事館的書記，大約是爲了太親美的「罪名」吧，被囚了六個星期，到十二月初才釋放。他曾在美國戰略參謀局工作，他能說一口很好的英語，並且打算赴美升學。他到公安局請求發給護照，公安局人員便對他說：「你和美國人實在太要好了。」於是他於十月十六日被捕，罪名是在抗日戰爭時曾經替地下工作者通訊。他是經過總領事的不斷交涉後，才被釋放出來的，而總領事也被迫保證不把這回事發表出來。

「最好的法國人是初來的那一些，」一個替法國政府做了一輩子工作的退職越南官員說。「可是，他們很快就失掉了他們在本國時所有的民主思想了。有人爲你服役，實在是太舒服了。」這倒是眞的。以前曾經英勇地爲他們的祖國作戰的地下軍，現在又爲了征服另一個國家而作戰了，即使是一個中立的或者甚至親法的觀察家，看見了也要愕然。有人問一個曾經逃出德國監獄繼續作戰的滿身勳章的軍官，爲甚麼他要打越南人，他的答覆是法國人常有的答覆：「一九四〇年我們打敗了，我們必須在這裏打下去，否則世界就會以爲法國人不能夠打仗了。」常常有些從前自動參加抗日的地下軍，認爲反法運動只是日本所煽動。可是現在他們發現一些夥伴被越南狙擊隊殺死了，於是便對越南人發生了仇恨。

有一些法國人還保留着他們的民主傳統。一九四六年二月，約有三四十名法國左翼份子，（其中有軍官）寫了一封信給達倘禮安上將，說明越南問題的唯一解決辦法，就是承認越南在法國聯邦內取得獨立，然後停止戰爭。沒有得到他們的允許，這封信就在社會黨的「未來報」和「公理報」發表。就在那天晚上，法國兵便把「公理報」的印刷所焚毀，把「未來報」報館搗毀。有一個法國少校在一個女簽名者背後貼上了「賣國賊」幾個字，然後把她拿到西貢的大街 Rue Catinat 來來去去地遊行示衆，差點沒有把她殺掉。這個少校並沒有受到處分。數日後，Le Clerc 將軍告訴他的士兵說：這些提議停止戰爭的，都是「賣國賊」，他們「在法軍後面施行暗害」，所以他們應該「被丟到海裏去。」

這些贊成越南獨立的人士，現在還有一些被關在牢裏。從日內瓦大學教育局派來的 Jean Chesneaux，就是其中一例。戰爭期間，他曾在巴黎參加抗德戰爭，並且準備離開這裏後便到中國和美國旅行去。他越過法軍封鎖線到越軍區域探訪，於九月回來時便被軍隊抓了去。他現在還被關在牢裏，雖然他是不能被加上任何罪名的，因爲法越並沒有正式宣戰。同時被捕的，還有二十三歲的法國軍官 Jean Jacques Petalot，他也是抗德戰爭的領袖人物。他於一九四〇年在法國北部辦一份地下報紙被捕受刑，坐了兩年的德國牢獄。他逃出了監獄，便做地下軍的聯絡員。他曾經在德國的法國佔領軍工作，現在被派到越南來。因爲他是共產黨員，所以他成了西貢的馬克斯主義者聯誼會的領導人。（這個聯誼會約有會員二百名，他們都是左翼的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對這裏的法國政策一向反對。）他的上司很快便知道他無心和越南人打仗了，於是便派他到新聞處工作，還常常派特務跟蹤他。他到過越南軍地區兩次，就在第三次，他就和 Chesneaux 一起被捕。

這就是今天越南的形勢了。抗德戰爭的英雄，因爲和越南戰友聯絡而坐了牢。同時，外國聯隊中的納粹兵，可以歡笑了。法國人雖然在法國吃了敗仗，他們却像要在這裏實現他們的理想了。

（譯自二月七日「密勒氏評論報」）

國軍官曾替我作了個估計，說關在監牢裏的人中間，有二千多個「愛國」左傾份子，「假如我們給他們機會，他們會和美國誠懇合作，使朝鮮成爲民主國家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在繁盛的商業中心大邱，僅只幾天工夫，就有六千五百以上的男女因犯「政治罪」而被捕，其中三千多人在美軍軍事法庭前以違反無所不包的「布告第二條」（反抗美軍）的罪名祕密受審。

訪問一個典型監獄

美軍佔領區中的犯人是些什麼人呢？

我和另一個記者去參觀一九四六年大暴動區域裏的一個典型監獄。獄中有四個暗牢，牢房的面積大約十尺長，十五尺寬，一共關了一百二十八個政治犯。犯人們按照日本監牢裏的傳統規矩，蹲坐在光光的地板上，面對着前面。有兩個牢房裏，因爲地方不夠大，犯人們不得不輪流蹲坐。

警察局長是一個頑固結實的傢伙，他向我們大大地訴苦。他說，十七天前他就把報告送到省軍政府的政治科去，但至今沒有下文。他請求在省城裏撥出地方來做牢房，也沒有回音。

京城的政府當局說，這些暴動都是北方派來的特務煽動起來的，因此我們要曉得監獄裏有多少是外來人。可是，警察局長告訴我們說，所有的犯人都是本地人，大部份是佃農。他們的面龐消瘦憔悴。警察局長接着又訴說囚糧不夠。

這位警察局長可不是個外行呢。他在日本警察隊裏受了整整十四年的訓練。他表示他從來不曾那樣忙碌過。

（本節完，全文未完）

本刊及本社出版各單行本調整售價啓事

敬啓者玆因還來物價飛漲，報紙、排印工及日常開支均猛漲數倍，本刊爲維持成本，自本期起調整售價，以資挹注。又本社出版各單行本，也一律自二月二十日起提高四成至六成發售。事非得已，倘希各地讀者及客戶諒察爲幸

世界知識社發行部啓

更正

本刊第十七卷第六期第二面漫畫插圖，付印時誤被印刷房工友倒置，特此更正。

啓事

一、「世界在火焰中」續稿，因倘未自美寄到，本期暫停。二、本社自即日起，代理訂閱「觀察」周刊，凡本刊讀者擬訂該刊者，可向本社發行科直接訂閱。

亞洲的新國

巴基斯坦紀實

美 Andrew Roth 作　史煉 譯

巴基斯坦的開國元勳和總督眞納（M.A. Jinnah），曾描寫巴基斯坦爲「最大的回教國……和世界上第五個最大的獨立國。」雖然這第二點還有斟酌餘地，但毫無問題，巴基斯坦已成爲値得受人注意的地方了，因爲她恰恰處於英美與蘇聯在中亞的戰略交叉點上。

很少有一個新國家，會在這樣矛盾的壓力之下，或背了一身如此交堆着問題的重荷而立國的。政府由少數高級官員所控制，並受着有權勢的官僚撐腰，而且不論在國防、財政和外交政策上，英國都有發言權。腐敗和皇親國戚之風滲透了政府的機構。回教的思想統治了整個的社會生活，這也包括了婦女的被奴役。無論如何，這個國家的結構，現在還來不及加以鞏固，國內的緊張卻已可能使她變形了。

眞納在形容他的自治領時說「她有着巨大的資源與潛力，」這雖是誇大的，但巴基斯坦在經濟上無疑是可以大加發展的。領土凡二十三萬平方公里，大於一九三三年德國的四分之一，人口七千萬，幾乎和一九三三年的德國一樣。在農業上，她儘自足而有餘，還能將一部份小麥、米和大量名貴的苧蔴輸出。此外還出產一些石油、鉻鐵並有巨大的水力潛能。在工業上，她在這塊正從事工業化的小大陸中卻是最落後的了。雖然棉毛廠、水泥廠和糖廠，遍佈全境，但衣著和其他製成品卻必須賴之進口；印度全境百分之八十五的苧蔴產於巴基斯坦，但是蔴織廠卻在

> 本文及前文「法越眞相」作者勞斯，是一位美國名記者，數月前曾訪印度，最近在太平洋及東南亞等地遊歷，著有「日本的難關」一書。

加爾各答。巴基斯坦素來缺乏煤鑛，只有一個現代化的港口：喀拉蚩。大部份人民目不識丁；在巴基斯坦，識字的人佔百分之四，而印度則佔百分之十二。這裏又像印度一樣，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中，太多的是律師，太少的是工程師。

與印度保持密切和友好的關係，是發展巴基斯坦潛力的基本前提。大會黨經過了幾年的僵持，最後終於同意了印回分治。一部份原因是因爲他們深信巴基斯坦是不能單獨存在的。「讓他們有他們的巴基斯坦吧，」他們主張說，「如果他們沒有了東方的孟加拉和西邊的旁遮普和加爾各答，他們就將沒有煤、首都和工廠，而我們就能夠在經濟上使她窒息。幾年之後，他們就會慢慢地回頭轉向我們了！」這種態度雖然不是整個大會黨的領導層都有，但對分治的促成實具有相當影響。在處分財產時，回盟對每一架打字機和每一令紙都絲毫不肯放鬆。

由於社團間的流血鬥爭和由此而產生的難民，使巴基斯坦的經濟紛擾愈益不能計數的增加起來。回盟領袖自眞納以下，幾乎每一個人都相信難民的泛濫，乃是大會黨企圖趁巴基斯坦政府尙未建立之前而使她沉沒的陰謀的一部份。「我確信尼赫魯並非這一個陰謀的同黨，」有人這樣說，「但我也確信它是由巴台爾（Patel 印度內政部長）和辛格（Baldev Singh 印度國防部長）所支持的。」

＊　＊　＊

充滿了許多問題的巴基斯坦，只有一批極其平庸的領導者，和這些困難搏鬥着。當然，大名鼎鼎的眞納，應該是例外的，可是他年紀已過七十，並且自從兩年前患了惡性肺炎以來，健康甚爲惡劣。他的聲音，只有離開他十尺路遠的地方纔能聽到。他所以擔任了總督而不擔任總理，一部份原因是因爲這一個差使比較容易。他曾對他的屬下再三訴述：「我已盡了我的天職，我將巴基斯坦交給了你們。要你們繼續締造。」

總理艾里可汗（Liaqat Ali Khan）是一個有着典型封建地主的保守思想和掌有大權的行政官，他深信英國是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經濟的同盟者。他選了一個有技術能力的人做他的財政部長，但是其他的閣員卻都是碌碌庸才。高級官員大都出身地主階級，其中極少數是律師和商人。巴基斯坦唯一具有現代頭腦的工業家伊斯柏哈尼（Hassan Ispahani）出任駐美大使了。各省的省府官員也都是同類人物：旁遮普省省長馬姆多特可汗（Khan of Mamdot），便是全省首屈一指的大地主。

聲勢浩大的反對派，今天雖然還沒有有機的組織，但它正日趨強大中。一九四四年後，當回教聯盟已經成爲一個羣衆運動，中小職工和貧農都紛紛參加，而也就是他們，最後獲得了分治。他們的參加回盟，許多人是通過宗教的手段而加入的，其他的也有因爲他們受了回盟給與改善他們生活條件的諾言而來參加的。他們對經濟情況的不滿，表面上是針對着印度族和錫克族的商業控制，但實際上卻逐漸地轉向於主要的回盟領袖了。有一個故事，西旁遮普省的首長陶丹納（Mumtaz Daultana），八月裏到她的宏偉的牡爾頓宮去，他的全部都是回聯忠實盟員的佃戶們，恭賀他對巴基斯坦的業績，這位地主並和佃戶們歡宴一堂。但掃興的是一個農民在宴會上發問道：「什麼時候把土地分給我們呢？」這個問題曾經被提起過好幾次，因爲土地改革原是回聯應允過的。

在各城鎭中，也同樣遍佈着這種對富人的憤懣。在拉哈爾（Lahore）最近一次的集會中，一個年青而熱情的回盟盟員叫嚷着：「闊佬們已完蛋了！讓我們殺了他們吧！」

若干過激派是自發的；其中有若干是回盟中進步工作的執行者，在整個巴基斯坦特別在旁遮普省，他們是勢力強大的。這些進步份子多是受過高等教育、具有現代頭腦和世界知識的年青人，他們有着一個強烈的民族觀點，在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上（包括婦女地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一羣人中最著名的是丁氏（Mian Iftikharud-Din），他，大家都叫他伊芙狄（Ifti），是一個多才多藝、激烈的回盟盟員，過去曾任旁遮普省大會黨的主席，曾

被英國人囚禁過兩次。他現在是巴基斯坦時報的發言人，又是制憲會議議員之一，他是一個青年、進步回盟盟員的希望，又是回盟領袖們的眼中釘。

＊　＊　＊

一個重要的鬥爭在這一個問題上——巴基斯坦和英國的關係究竟緊密到如何程度——正在日益明顯地展開着。具有民族主義頭腦的巴基斯坦人（他們中間大部份是青年及新加入的回盟盟員，）都被英國人在行政機關中所佔的數目而驚慌起來。五個省份中的三個省長、九個部長中的五個以及所有軍隊中的高級官員，都由英國人擔任。精明的民族主義者想保留相當數目的英國人來幫助技術上的發展是必要的，但數目可不能太多。軍隊中的官長們並不反對暫時在英國將軍指揮之下，但他們担憂的是他們軍隊只許用英國的配備，並憤慨着巴基斯坦的軍權由英國人一手掌握。有幾個民族主義者控訴說，當一年前艾里可汗首相在倫敦時他曾與英國協議，允許巴基斯坦仍舊保留在英國的經濟領域以內。

在旁遮普，甚至連回盟右翼盟員也是反英的，這是因爲英國曾把回盟排斥在政府之外有一年以上，更因爲印巴邊境的劃界不公平。結果，大批英國人被解職，但他們却又轉入在喀拉蚩的中央政府內任職了。例如鐵路專家霍爾（A.G. Hall）被旁遮普省府解了職，現在却任爲全巴基斯坦的鐵路總督了。對於反對大部份英國人留職巴基斯坦的抗議，首相回答說：「政權讓渡前，蒙巴頓公爵在印回臨時政府中就允許所有英藉官員憑其意願以定去留，我們不能有牴觸這一先例的特殊情形。」有趣值得指出的是，凡仍留職的英國人，極大多數選擇了巴基斯坦。由這一點就可看到一個事實，沒有開發的國家的機會是比已經開發的大得多了，在英國人中，他們有一個確信不移的感覺，那就是當印度宣佈獨立了，巴基斯坦將仍會在大英帝國的領域之內。回盟領袖們的本質又使這一個可能大大增加，在回盟領袖中，竟會沒有一個人懂得什麼是戰鬥的民族主義的。

自從巴基斯坦立國以來，回盟的官員們在關於蘇聯和西方國家鬥爭的立場上，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巴基斯坦在地理上，比之於英美當然是蘇聯最爲接近，而大多數輿論又表示對蘇聯表示興趣。甚至正統派的回教徒都密切注視着蘇聯境內回教區域的發展，譬如波哈拉（Bokhara），它不論在文化上或在地理上都與巴基斯坦的關係甚爲密切。並不是所有進步的回盟盟員是親共的，但是許多人都似乎覺得某種的社會主義，常常被他們所提到的如「回教的社會主義」（Islamic Socialism）是創造一個強盛的現代化的巴基斯坦所必要的。任何爲了個人貪慾而將巴基斯坦的軍事力量和戰略地位抵押給英美的企圖，必將引起壓倒的反對。

回教聯盟的未來已經成爲一個爭論的主題了。那些衰老的回盟官員，懼怕那些貧窮的回民會跟着進步份子走。他們正在放棄那曾經帶給他們以權力的組織，並日益依賴於官僚政治的機構，這些官僚政治又是從英國和他們自己的貪污政權所承繼下來。回盟的宗教領袖們都攻擊着那些年青而具有新思想的進步份子爲「反回教」，並且告訴巴基斯坦婦女們，叫他們忘記政治走回到「潘特」（Purdah，印度婦女避人注意的特製帳簾）裏去。但是，時針不容倒撥。「我們已經懂得，就是婦女也是有力量的，他們決不能使我們忘記政治，」一個拉哈爾的家庭主婦對我這樣說。（節譯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美國「民族」周刊）

喀什米爾之戰

英・Iqbal Singh作　葵軍譯

在安全理事會討論印度控訴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進行戰爭的議案以前，喀什米爾問題已經發展到一個愈益複雜的階段了。事實上，它已不復是一個單純的印巴之爭，而已成爲世界性的問題，這個問題似乎將發生深遠的國際反響。

據可靠來源的消息，印度政府起初將這事件交付聯合國，倒不是完全出於自己的本意。尼赫魯所以被迫採取這一步，主要是由於白廳及其駐印度的代表蒙巴頓的壓力。英國政府所以這樣切望拿這件事交給聯合國，是和新德里的政界有關的。他們切望對付喀什米爾像對待旁遮普一樣，使它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分割開來。大家知道，過去一度時期曾有一個「蒙巴頓的喀什米爾計劃」，這是分裂印度的一個縮影。在新德里，這件事曾被廣泛地宣傳着，而在英國報紙上，也出現了有人所授意的社論，叫大家接受這計畫。這個計劃的目的，是根據社團血統的界線，來分割喀什米爾，跨過並破壞那阿白杜拉（Sheikh Abdullah）所領導的人民民主運動。

英國的解決方案是根據下面幾點擬定的：一、當安理會的要求提出時，印度和巴基斯坦應立卽成立停戰協定；二、巴基斯坦應拒絕給予襲擊者以一切交通的便利，俾使他們無法從巴基斯坦進入喀什米爾；三、當停戰令生效後，緊急狀態卽應宣佈過去，而阿白杜拉應卽放棄他現任的緊急行政機構首長的地位，未決案件歸由全民投票最後解決；四、在聯合國小組委員會的主持下，喀什米爾應舉行複決投票，這小組委員會由美英代表組成，蘇聯代表不在內。蒙巴頓會以很大壓力施給尼赫魯，叫他接受這方案，作爲臨時解決的基礎，這在新德里，已是一個公開的祕密了。理由是喀什米爾的形勢如果繼續下去，就將導致印巴兩國公開的戰爭，這不但將使他們兩敗俱傷，而且還將給予美蘇以干涉的機會，而這也許將「引起另一次的世界大戰。」因此，世界進步的輿論應該明白，喀什米爾之爭並不僅僅是一個印巴之爭。對這件事有重大關係的，還有一個第三者——這就是喀什米爾的人民。說喀什米爾今天已成爲印度民主鬥爭的試驗場，並非誇言。因此喀什米爾人民的觀點如何，也是大家所必須知道的。這個觀點是由人民緊急政府主席阿白杜拉在單獨接見我的時候告訴我的。他說：「喀什米爾問題，有兩個方面。第一，我們的鬥爭是爲了喀什米爾人民的自由和爲了爭取人民選擇自己所喜愛的政權的權利。在這一鬥爭中，我們認爲是沒有妥協餘地的。「在過去十七年中，人民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曾經向都格拉王朝（Dogra）的專制政權進行了不折不撓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我們許多同志或犧牲了生命或入獄，而那個時候眞納和他的追隨者，却遠遠的避開了鬥爭，並且甚至主動地和瑪哈拉耶（Maharajah）政府站在一邊。

「第二方面，」他繼續說，「是喀什米爾是否加入印度、巴基斯坦或繼續保持自治的問題。我們的看法恰和眞納相反，他認爲主權不是屬於人民，而是屬於帝王，我們認爲主權是必須屬於人民的。應該是他們決定是否加入印度、巴基斯坦或繼續自治。同時，我們一直準備着，極願和巴基斯坦攜手，在經濟和文化上與巴基斯坦密切交流。我們的運動，包括所有居住在喀什米爾的社團，無條件的排斥造成巴基斯坦基礎的「兩個民族」的理論，因此我們覺得我們的政治前途是寄託在更前進和更進取的印度聯邦上。我們願意當侵略者從我們的土地上逐出，而正常的情況回復後，將這個問題舉行一個自由而民主的全民投票，來加以決定。人民的判決結果將要如何，我們絲毫沒有懷疑，我們並且願意接受國際上對我們全民投票的監督。

「今天喀什米爾所進行的是什麼？」阿白杜拉總結說，「是一個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一條是民主和封建壓迫之間的鬥爭，一條是民族主義和狹隘的社團主義之間、以及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觀念和一個中世紀的迷信之間的鬥爭。」（譯自一月十五日倫敦「每日工人報」）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七期